

## 第四章

### 抗日军兴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h.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h.com

## 一、平汉路北段的涿州、保定战役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相继签订后，我冀、察两省实际上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华北局势日益险恶。日本方面并未以国民政府的不断妥协退让为满足，反而加紧策划对华北的“分离”阴谋，企图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建立一个由日本直接控制、与伪“满州国”有密切联系的特殊区域。1935年10月，日本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二十二县“非战区”，成立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接着又在内蒙策动蒙古贵族德王成立所谓“内蒙自治政府”。同年12月，国民政府再次屈从日方压力，在北平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进一步满足了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问题上屡屡得逞，更助长了其侵华野心。1936年8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通过所谓《国策基准》，企图压迫中国正式承认伪“满州国”，并决定以军事手段占领中国华北，使其与东北、内蒙联成一片，作为日军在华的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战略目的。为此，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大肆增兵华北，并更加频繁地在华北

地区进行军事挑衅活动，加紧策划扩大侵华战争。日本关东军头目甚至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7日晚，驻北平西南丰台的日军在芦沟桥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是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蛮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首先向宛平城开枪开炮，守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抵抗，予敌痛击，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中国都在危急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更加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中枢也进一步坚定了实行全面抗战的决心。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庐山演说，表示抗日“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同时也做了各种紧急应付战争的准备，迅速在国内进行了战争动员和部署，并相继调动第26路军孙连仲部、第40军庞炳勋部、第53军万福麟部、第13军汤恩伯部、第52军关麟征部（即原第17军）、第14集团军卫立煌部、第84师高桂滋等部增援华北前线。

当时，我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抗战一爆发，我即奉命匆匆返回第2师，随即率部开往平汉线北段满城、保定、新安镇一线赶筑防线。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只能在行

军途中对官兵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本师因参加过长城抗战，对日作战有一定经验，加上受全国抗日救亡热潮的影响，官兵均对日寇怀有仇恨心理，故士气是很高涨的。

我第52军各师赶至保定以北新安、漕河、满城一线阵地时，平津已经失陷，日军正调集重兵从北平、天津分三路发动攻势：一路沿平绥路西出南口，进攻山西、绥远；一路沿津浦路向南攻打沧县、德州，进攻山东；一路沿平汉路南犯，进攻涿县、保定、石家庄。华北局势极为危急。与此同时，日军还以重兵在华东淞沪地区发动进攻，企图南北夹击，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其气焰嚣张至极。

在平汉路方面，中国军队的作战主力为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辖第26路军、第53军、第52军等部，第20集团军商震部、独立第46旅也配属在这一作战区域。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将军驻节保定指挥作战。

中国军队在平汉路方面的作战要领是，沿平汉路多线设防，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期实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其具体部署是，以第26路军孙连仲部、第53军万福麟等部为第一线防御部队，防守房山、周口店、琉璃河、码头镇、固安、永清一线，保卫保定前哨涿州；以第52军关麟征部为第二线防御部队，防守新安、漕河、满城一线，拱卫保定城；以第20集团军和独立第46旅为第三线防御部队，固守石家庄以北之正定。

9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主力（第6、第14师团）避开涿州正面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分由固安、永

清强渡永定河，侧击涿州，但遭到守军坚强阻击，孙连仲将军亦派出有力部队在拒马河一线堵截敌人。次日，日军增调兵力，在战车、重炮掩护下，加强攻势，强渡拒马河，将守备这一线阵地的第47师裴昌会部分割包围，守军与敌激战半日，被迫突围撤退。18日，涿县陷落。日军遂长驱直入，沿平汉路两侧向保定扑来。

涿县一失，保定失去屏障，其防御岌岌可危。这时前线友军在日军压迫下纷纷溃退，已经无法节制。刘峙将军非常焦急，急电南京中枢请求火速增派援军。但中国军队大部主力此时正在淞沪战场与日军鏖战，无法北调，南京中枢只得指示刘峙将军“应就现有兵力，努力支撑，与敌持久”。并要求第2集团军“在保定附近与敌决战”。

防守保定的中国军队只有第52军（辖第2师、第25师）和刚刚增援上来的陕军冯钦哉部的第17师。以后云南部队第三军曾万钟部奉命增援保定，但该部未开至前线，即借口与刘司令失去联络，匆匆退往安国。尽管兵力如此单薄，第2集团军还是决定坚守保定。

我军防守保定的部署是，我的第2师居中担任保定城防及平汉路正面防御。第25师在本师左翼，防守满城至保定一线阵地。陕军第17师在本师右翼，防守保定至高阳一线阵地。据此，我命令第4旅守卫保定城垣，第6旅在保定以北沿漕河南岸占领阵地。并命该旅派出一营兵力向徐水方向警戒。我的指挥部设在城南关外。

9月20日，日军突破徐水、遂城之线，以第6、第14、第20师团共三个师团的强大兵力向我满城、漕河、新安防

线席卷而来。孙连仲的第26路军抵敌不住，纷纷经满城向后方溃退。本师第6旅派向徐水方向警戒的一营，在与敌人发生前哨战后，即撤回漕河一线阵地。

22日晨，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满城、漕河一线阵地发动猛攻，正式拉开了保定战役的序幕。

日军依仗着强大的炮火优势和雄厚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了一次次凶猛的进攻，战斗极为激烈。第52军以仅有的两师兵力，沿漕河南岸，右依湖沼地带，左倚满城高地，防守着长约四十华里的广大正面，兵力颇为单薄，且漕河水浅，随处可以徒涉，不成障碍，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幸赖我军士气旺盛，将士用命，拚死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战至午后，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而至，攻势愈加凶猛。日军飞机不断向我军阵地低空俯冲，扫射轰炸，敌重炮群也隔河齐射，将我漕河南岸阵地几乎全部击毁，继之出动大批步兵在十余辆战车的掩护下涉河向我军轮番冲击。我第6旅伤亡惨重，官兵们匍匐在倒塌的工事里，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顽强抵抗，将一批批冲上来的日军消灭在阵地前，漕河河道里也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日军尸首，将河水都染红了。由于我军缺乏战防炮，对敌人的战车活动一时没有办法，致使其几度冲入我军阵地，左冲右突，给我军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一些士兵使用炸药和集束手榴弹，冒死爬上敌战车，将炸药和手榴弹挂在战车上，将其炸毁了几辆，其余的见情形不妙，才仓皇遁回北岸。

黄昏以后，战斗仍在持续。我军与敌人血战一天，伤

亡很大，第6旅旅长邓士富连连向我请求增派兵力，我从城内抽出一部兵力增援了上去。入夜，双方在满城、漕河全线激战整夜，枪炮声震耳欲聋，战火映红了夜空。

翌日黎明前，日军终于突破了第25师在满城高地的阵地，随即向我军左翼迂回攻击，与第25师各团混战。我闻讯急命第6旅抽出第11团，前往增援该师作战，但敌人已乘虚涉过漕河，第11团险被包围，经苦战才摆脱了敌人。我见漕河阵地已不能守，只得命令第6旅放弃沿河阵地，退守保定城垣工事。

当日上午10时许，敌人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掩护下，直扑保定城下，敌战车多辆亦经过漕河铁桥（该桥曾为我军爆破，因破坏不彻底，很快为日军修复）直冲保定城北门。保定城墙外虽有一道护城壕，但并不能发生作用，很快被日军突入，双方在北门内外和附近城垣上发生剧烈的肉搏战。我见战况危急，急命师直属部队前往增援，并令部队由两翼组织反冲击，截断攻城的日军。激战到中午，我军终于将突入城内的百余名日军全部歼灭，并将余敌逐出沿城工事。以后敌人又发动了几次攻击，均为我军坚决击退。

日军见正面进攻受挫，遂派一部兵力迂回袭击于家庄和方顺桥车站，黄昏前亦被我军打退。

午后三时许，我正指挥部队与敌激战，关军长突然打来电话。我刚刚拿起听筒，耳边即传来他急促的声音：

“郑师长吗？你那里情况怎样？”

我报告了已将敌人击退，现在与日军在城外对峙的情



况。关氏听后连连说：

“好，好！保定一定要守得时间长一些，愈长愈好。”停了一下，他又说：“现在第25师压力很大，有的部队已经垮下去了，我准备转移阵地，将第25师布置在保定以南地区，作军的预备队。裴昌会的第47师正在向我们靠拢，刘总指挥已命令他协同你师守城。你有什么情况可随时与我联系。”

我又问刘总指挥现在何处，关氏回答说他已经撤到后方去了。话未说完，电话就中断了。

傍晚，日军攻击一度减弱，我估计敌人正在准备新的攻势，乃抓紧时间调整部署，决心与敌人背城一战。谁知晚上情况突然发生逆转，日军一支骑兵部队，乘第25师后撤，偷偷由我军左翼包抄过来，袭击了本师后方机关，将辎重部队、医务队和电台等全部冲散，并对保定采取包围态势。这样我们同上级和友军完全失去了联络，后方补给也中断了，保定事实上已成为一座孤城。我感到事态严重，因电话通讯也已中断，遂派人连夜去寻找军部请示机宜，并与友军第17师联络。午夜前，派出去的人先后失望而归，报告说军部和第25师早已走得不知去向，根本未在保定以南地区停留。右冀第17师也无法联络上（事后得知他们也早已后撤了）。

当时我对关将军很有看法。我们都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共事日久，彼此总该有些关照，但作战时他将我这一师摆在最危险的地方，撤退时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任凭我们去牺牲，不仅全无一点情义，而且也太不负责任。更令

我心焦的是这一师人今后的命运。我辈身为军人，要对国家负责，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弃城不守。可眼下大敌压境，我们的一切外援均已断绝，孤军困守危城，要想扭转战局已不可能，这样硬撑下去也只能是坐以待毙。何去何从，我苦思一夜而无良策，最后决定还是先坚守下去，待第47师裴师长来后再作商议。

24日天刚亮，日军就对保定城发动了全面总攻。敌人多架战机发着凄厉的尖叫声，在保定城上空往复俯冲、轰炸，士兵们伏在工事里，几乎可以看清楚敌飞行员的面目。不多时，城内便硝烟弥漫，燃起多处大火。紧接着，日军集中几十门大炮猛烈轰击我城垣工事，长达一小时之久。敌人的一排排炮弹铺天盖地袭来，炮火之猛烈达到空前程度。据守在墙垣工事里的官兵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城墙也被打塌了多处，形成了几道很宽的缺口。日军千余步兵乘机蜂涌突入，与我守军短兵相接，发生激烈混战。我军官兵虽然遭到敌人炮火很大杀伤，仍顽强据守在城内建筑物里和街道两侧民房屋顶上，居高临下，以交叉火力猛扫突入城内的日军。城墙缺口边躺满日军尸体和伤兵。但敌人愈来愈多，大批日军在战车掩护下继续涌进城内，并向两翼扩展以发展战果。

正在城内巷战激烈进行之际，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赶到了。他将队伍驻扎在城外，只带了几名随从匆匆来到我设在南门城下的师部。裴氏北伐前原系孙传芳部下一员战将，久历戎行，作战经验丰富，所部也颇有战力。这时各路友军已不受命令约束，都在竞相向后方逃命，惟裴将军

不避艰险，依令而来，此举使我对他十分敬重。

见面后，裴师长便急切地了解城内战斗态势，并向我询问是否将其所部官兵开进城内与日军接战。我请参谋长舒适存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敌我战斗情况，以及我军所面临的险恶处境，说明目前日军完成了对保定的战略包围，我军孤军作战，恐难挽回败局，且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裴氏闻言默然良久，未明确表示态度。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此刻死守保定城已无希望，只是碍于未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而不好言明。

到了上午11时左右，我守军已防守不支，日军逐渐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并对我军实施分割包围，第4旅旅长赵公武率大部守军被迫突围向保定东南的张登镇方向转移。此时城内一片混乱，除了师直属部队以外，我对其他各旅已失去掌握，形势万分危殆。我的参谋长舒适存见情况紧急，在一旁焦急地说：

“依目前情况，我们很难支持多久，现在或是死战殉城，或是乘机自动撤退，以全实力，请两位师长速做决断，否则就来不及了！”

裴将军也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知道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下去，遂下决心说：

“我们并未奉死守到底的命令，况现已抵抗二昼夜，孤军难支，应撤出保定以保全部队，将来若有问题由我承担。不知裴师长意见如何？”

“我同意郑师长的决定，此事还是大家共同负责，就赶快行动吧！”裴将军见我态度明确，遂也表示同意。

我见大家均无异议，乃下令撤退。这时日军已逼近南门，我指挥骑兵团、工兵营、通讯营、山炮营、特务连等师直属部队且战且退，沿平汉路向南撤退，保定城遂告陷落。

日军以攻占保定为目的，并未认真追击我军，所以我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敌人，一路向南走。我原以为关军长会在唐河南岸占领阵地接应我们，两师会合后再作他图。谁知到了唐河岸边，友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问方知他们在唐河也未停留，一直向南撤退了。

此时第47师已与我们分开行动。过了唐河后，我慢慢把溃散的部队收拢了。由于没有通讯设备，与上级联系不上，也不了解敌情，部队只好盲目地向南走。那时我们的辎重粮草都丢光了，部队没有饭吃，幸亏沿途百姓帮助，才饥一顿、饱一顿地挨了下来。

事后得知，因为我们与后方消息隔绝，人们以为本师已在保定全军覆没了，有的报纸还发表了我“壮烈殉国”的消息。我的家人闻此谣传，着实虚惊了一场。

大约在9月底，我们才找到后方部队。不久部队又撤到邢台。这时程潜将军刚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该地。他听说我是从保定撤下来的，特召我前去谈话，抚慰了一番，并很详细地了解了保定战役的情况，以及日军的装备、火力和作战特点等。

当时，为了挽回平汉线上的败局，程潜将军正调整部署，拟在正定附近滹沱河畔与日军决战。但因山西战局吃紧，平汉路方面的中国军队主力纷纷经娘子关调入晋东地

区作战，只留下第20集团军商震部、第3军曾万钟部、第53军万福麟等部分守正定、石家庄等地，兵力十分单薄，无力抵抗日军的凌厉攻势。10月8日，日军攻陷正定，随后又接连攻陷石家庄、邢台、邯郸等重镇。11月5日，连豫北要邑安阳也失守了。至此，中国军队在平汉路北段的战事完全失利了。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平汉路北段乃至整个华北的作战失利，究其主要原因有三：

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抗战准备。虽然自日本在华北加剧侵华步骤以来，南京中枢已觉察到日本企图鲸吞中国的野心，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但对芦沟桥事变这一突发事件迅速演变为全国性抗战，明显估计不足，甚至还对日军进攻华北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西方国家出面干预、调停。因此当日军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平津之际，我大批援军尚远在冀中、冀南地区观望，坐失战机。直到日军占领平津后，分三路大举向山西、山东、河南进攻时，方如梦初醒，各军仓促前往应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混乱的境地，此其一。

国民党军队内部各派系间矛盾重重，互相猜忌，各图自保，指挥系统不统一，遂为日军各个击破。如涿州、保定之役，一些将领不负责任，亦不服从命令，使坐镇保定的刘峙将军不能自如地调动部队，无法组织各部与敌决战。特别是前线失利后，各部为保全实力，竟置大局于不顾，争相撤退，连中央军也是如此，由此导致全线崩溃，此其二。

军事上采取“多线设防、步步为营、节节抵抗”的消

极防御战术，更是造成我军失利的致命原因。以当时中日军队相比较，我军在武器装备与训练素质方面远逊于敌，而将兵力分散主要作阵地防守，不仅大大限制了我方的作战机动性，使我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且因以有限兵力占领广大正面，使我军既不容易作持久抵抗，亦无法集中兵力对敌实施有力反击。日军反倒因此得以充分发挥其装备优势，集中兵力与火力突破我军防线中一点，便使我方全线瓦解，此其三。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虽然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但在华北战场上还是遭到严重失败，很快就丧失了大片国土，使抗日正面战场上，出现了极为不利的形势。

当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正在淇县休整，为牵制日军继续南下，遂奉命开往林县山区游击作战。

初到林县地区，我们人地两疏，又是在敌后活动，处处显得畏首畏尾，打不开局面。因为国民党军队历来只会正规作战，就怕失去后方，对游击战更是一窍不通，根本不会像共产党军队那样去发动和武装群众。以后时间长了，情况才稍有些改变，常常以小部队分散出击，四处袭扰敌人。记得某次本师派出的一支别动队，乔装成日军，深入到安阳附近，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飞机场，给敌人造成较大恐慌。

不久，本师又奉命转移到漳河地区，接应由邢台方面撤退下来的第一战区部队。在漳河南岸，我们与一路穷追我军的日军打了一场恶仗。那天，一支日军先头部队乘夜偷偷渡河，击溃第25师一个团，随后与本师骑兵团激烈交

战，我闻讯迅速集中师主力压上去，迫使日军龟缩在漳河南岸的几个小高地上动弹不得。可惜我军火炮太少，缺乏攻坚能力，反攻一昼夜未能消灭这股敌人。后因掩护任务已完成，加上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才奉命撤出战斗，全师开往河南舞阳休整。

这次战斗中，曾有一段小插曲。在我军撤退前的下午，我正在漳河河畔指挥战斗，忽见远处一架受伤的飞机摇摇摆摆地由北向南飞来，乃立即向军部报告。关军长不加思索，高兴地说，那是敌人的飞机，被第25师打伤的。我心里有些奇怪，因为漳河以北并无第25师的队伍，怎么会在那个方向打伤敌人的飞机？但也未细问。过了一会儿，那架飞机坠落于地，军部马上派人前去查看，发现飞机是我方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关军长赶忙又特地打电话给我，声称飞机不是第25师打的，让我哭笑不得。

## 二 徐州会战

1938年初，国内的抗战局势是相当严峻的。在华北方面，中国军队节节溃败，失地千里。继平津沦陷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德州等重镇先后失守，我军被压迫至黄河南岸；在华东方面，七十万中国精锐部队在淞沪战场与日军浴血鏖战近三个月，虽予敌很大杀伤，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预言。但终因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使我军腹背受敌，遂导致全线溃退，连首都南京也于1937年12月13日被日军攻陷，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日军在南北战场得手后，紧接着将下一个进攻目标指向徐州。

徐州，地处津浦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皖、豫四省要冲，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调集重兵分别由津浦路南段、北段进攻，迅速打通津浦线，夺取徐州，再循陇海路西进，取道郑州南下，占领我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武汉。

为了稳定战局，我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指示负责这一区域作战指挥的第五战区长官部，利用黄河、淮河天险，遏制日军攻势，力求保持我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



保郑州和平汉路南段侧背，使武汉后方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战略部署，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

于是，中日两国军队以攻守徐州为目标，在津浦路南北两段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这就是著名的徐州会战。

会战初期，日军以津浦路南段为主攻，北段为助攻，分由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推进。

在津浦路南段，日军近卫师团、第13师团、第106师团等共八万余人在畑俊六大将指挥下，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上。日军一部主力在攻陷滁州后，循津浦路正面向北进至盱眙、张八岭一线；日军另一部主力在攻陷裕溪口后，亦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一线。在这一方面的中国守军第11集团军李品仙部、第51军于学忠部，以及后来增援上来的第21集团军廖磊部、第59军张自忠部，则利用池河、淮河、淝河、浍河等地形障碍，节节抗击日军北犯。中日军队在淮河流域激战近两个月，双方都有较大伤亡。日军虽一度打过淮河北岸，但在我军有力反击下，又被迫于1938年2月下旬退回南岸，与我军隔河对峙，此后战事便胶着于淮河一线。

日军在津浦路南段进攻受挫后，鉴于其“南北夹击”的计划无法实现，乃不得不改取“南守北攻”的战略，以其精锐的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共五、六万兵力，在津浦路北段迅速向南推进，会攻徐州。

先是，日军第10师团及本川旅团，于1937年12月23日夜渡过黄河，负责这一线防务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

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为图保存个人实力，竟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擅自放弃黄河天险，率八万大军望风而逃，使日军沿津浦路长驱南下三、四百华里，如入无人之境，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连陷济南、泰安、兖州、曲阜、济宁、邹县等城，致我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徐州危殆。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急调川军第 22 集团军孙震部开赴临城以北，正面堵截沿津浦路北段南下的日军第 10 师团，并命退守鲁西地区的第 3 集团军孙桐萱部（原该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已被逮捕枪决）侧击津浦路附近南下之敌，方使战局稍有稳定，敌我对峙在邹县、滕县之间。

在日军第 10 师团于鲁南大举进攻之际，日军第 5 师团亦由保定开到青岛。1938 年 2 月中旬，该敌见我双方在津浦路南段淮河流域相持不下，遂全师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后，再循台潍公路南下，企图夺取鲁南军事重镇临沂，与津浦路北段正面的日军第 10 师团相呼应，从东路包抄徐州。

从日军在津浦路北段的部署和行动来看，敌人是相当骄狂的。他们根本未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以为只要挟其胜利余威，长驱南下，分进合击，即可一举击破津浦路北段之我军，迅速攻占徐州。

我最高军事统帅部和第五战区长官部，抓住日军孤军深入、冒险轻进的弱点，决定利用我军的优势兵力，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于敌分进运动，没有合围前实行各个击破，以确保徐州。为此，第五战区长官部作出如下

部署：命第3军团庞炳勋部由海州移驻临沂，阻击循台潍公路南下的日军第五师团；将津浦路南段怀远地区的第59军张自忠部调至北段滕县南侧，作为津浦路北段正面第22集团军孙震部的预备队。同时请准将原属第一战区战斗序列的第20军团汤恩伯部控置于运河以北地区，形成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相机在友军配合下歼灭津浦路正面敌人。命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迅速开往鲁南，支援第20军团作战；命第24集团军韩德勤部在高邮、宝应一带，拒止由扬州北进之敌，掩护运河的交通；命第11集团军李品仙部及第21集团军廖磊部、第51军于学忠等部，拒止淮河沿线日军。

我军部署尚未完成，日军第5师团主力已扑至临沂城下，与我第3军团庞炳勋部发生激战。

第3军团原系西北军旧部，不久前在津浦路北段的姚官屯、沧县之役中受到很大损失，未及补充，虽名为军团，实则只有五团兵力，实力尚不足一个军。但庞部官兵同仇敌忾，据城死守，与敌血战兼旬，使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第5师团是日军中最为精锐的“王牌”部队之一，号称“钢军”，此番竟受挫于一支装备低劣的中国“杂牌部队”，使敌酋板垣颜面大失，乃加急督战，拚力攻城。第3军团经连日苦战，伤亡奇重，在敌重兵猛烈攻击下渐感不支，频频向徐州告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闻报急调第59军张自忠部星夜前往驰援。该军于3月12日以强行军的速度抵达临沂西郊，时日军攻城正急，守军穷于招架，忽见援军开至，士气大振，遂里应外合，共同发起全面反击。敌第5师团在临沂城下屡攻不下，已是师老兵

疲，忽遭我第59军这支生力军的迅猛打击，阵脚大乱，也顾不得昔日“皇军”威风，仓皇溃退九十华里，缩入莒县城中不敢出战，我军取得了临沂大捷。

临沂一战，斩断了日军由津浦线南下的左翼，其两路会攻徐州的计划遂成泡影。同时，敌第5师团的失利，也造成了敌第10师团沿津浦路孤军深入的态势，为尔后我军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在我军于临沂获捷之时，津浦路北段正面防线又告危急。3月中旬，敌第10师团乘我第59军东移，再度大举南犯。我第22集团军兵力单薄，装备亦极差，在强敌压迫下且战且退。3月16日，日军濑谷支队五千余人进迫滕县，向守军第122师王铭章部猛烈进攻。

第五战区长官部根据敌情变化，命令第20军团先以驻河南归德的第85军输送至滕县附近支援第22集团军作战，掩护军团主力在运河以北地区实行战略展开，拟于临城东西之线歼灭冒险轻进之敌。

第20军团共辖第13、52、85等三个军，但实际只有五个师和一个独立骑兵团。第13军军长由军团长汤恩伯兼任，下辖第110师，师长张轸；第52军，军长关麟征，下辖第2师，师长郑洞国。第25师，师长张耀明；第85军，军长王仲廉，下辖第4师，师长陈大庆。第89师，师长张雪中。

我在3月中旬接到第2师火速开往运河以北之临城附近集中的命令，随即率部由河南舞阳经周口、亳州、归德兼程前进。本师的行军序列是，第6旅先行，师部和第4旅

随后跟进。

3月18日傍晚，我率师部及第4旅刚刚到达第五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徐州，即惊悉滕县已失，师长王铭章将军以下二千余官兵壮烈殉国。敌濰谷支队第63联队同时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南下，与我第85军先头部队发生激战。此刻，日军正在积极南犯中。鉴于战局发生如此急骤变化，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之线迎击敌人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可能因立足不稳而为敌各个击破，这样连徐州亦将陷入险境。为此，师参谋长舒适存向我建议：师主力迅速开抵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我亦认为舒氏的想法不失为应急良策，但又考虑这与战区长官部的命令相抵触，事关重大，不好擅作决定。正迟疑间，关麟征将军率军部也赶到了。他听了舒氏的想法，也表示赞成，遂决定由他即往长官部报告情况，并决心将本军行动改为后退集中。

计议已定，我命令部队连夜乘火车至运河以南利国驿站下车，随即驰赴韩庄附近，沿运河南岸占领阵地。同时以无线电指示担任前卫的第6旅与枣庄、临城间的第85军联络，相机由津浦路东侧向韩庄以东地区归还。

3月19日晨，本师先头第6旅一部已赶至临城东南20华里处的沙沟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部队在韩庄、利国驿一线集结。但该部尚未及构筑工事，日军已从临城方向奔袭而来（临城17日晚失陷），我军抵敌不住，只得节节抵抗后撤。午后二时前后，我率师部和第4旅到达利国驿车站，这时敌人已夺占韩庄，其步兵约千余，在十余辆战车

的掩护下向我第6旅猛烈攻击，企图强渡运河。我见情况危急，即命第4旅冒着敌人浓密的炮火跑步沿运河南岸布防，与日军隔河激战，暂时遏制了日军的攻势。约午后三时许，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而至，再度向我军发动猛攻。恰巧此时配属本师的一营炮兵也已运到。该营配备有12生榴弹炮十二门，这是当时威力较大的一种火炮。我命炮兵营长立即放列射击。不多久，我军大炮怒吼起来，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入敌阵，将日军进攻队形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据守运河南岸的我军步兵见状欢悦无比，齐声喝彩。自抗战以来，我师都是在敌人的优势炮火压制下作战，吃了不少亏，唯这一次算是狠狠地给了日军一次教训。

日军见我军炮火猛烈，不敢再冒然强渡运河，遂以炮兵还击，双方隔河展开炮战，至晚方息。此后日军因南岸我军严阵以待，乃以主力东移，沿枣台支线进攻台儿庄。

运河南岸利国驿一战，实属我军之幸运。倘当时我第一线作战部队未依实际情况而灵活处置或动作迟缓，使日军冲过运河，则徐州势所难保。而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我友军各部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皆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19日晚，汤恩伯将军来到第2师师部视察，对本师当日战果甚表满意。他还转达了第五战区长官部的作战命令，其要旨是：1. 命新由郑州、洛阳赶至徐州北的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及第20军团第110师接替第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2. 命第20军团主力第52、85两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在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

带集结、迂回，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进攻台儿庄，企图一举夺取徐州时，即行南下，积极向临枣地区日军之侧背攻击，断敌退路，会同第2集团军将敌压迫至微山湖畔歼灭之。

根据这项作战命令，本师于次日将运河南岸的防务移交给第110师。为了保守行动秘密，部队于20日晚才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

第52军抵达向城后，得知情况如下：1. 日军第10师团已攻陷枣庄、峄县，其主力在临城、枣庄、峄县各有一部；2. 第85军王仲廉部现在枣庄以北抱犊崮一带山区集结。

3月22日，第52军奉命秘密向枣庄以东之鹁鸽窝、郭里集之线挺进，准备按作战计划与第85军从东、北两方面向枣庄进攻。第25师为军之先头部队，经新兴庄沿九山北麓，循临枣大道，向郭里集附近地区前进。军部率第2师及炮兵第7团一部，在第25师之右后成梯次，经南岩、税郭以北高地边缘，向郭里集东北之鹁鸽窝一带前进。

次日黎明，忽闻郭里集方面传来密集枪炮声，后来才知道这是第25师第75旅与日军一支先头部队发生了一场颇具戏剧性的遭遇战。原来在该旅到达郭里集之前，我军便衣侦察队曾于白天到过这一带，发现新兴庄、郭里集一带均无敌情，乃于黄昏前离去。谁知傍晚时有一支约五、六十人的日军小部队也到达该村，敌人想不到我军会来到这里，便照例大模大样地在村边的炮楼里住了下来。我军也疏于防备，竟未察觉，这样敌我居然同宿营在一个村落里。

天亮后，敌人发现我军，立即从炮楼里开枪射击，有十余人伤亡。第75旅最初以为是敌人暗藏之便衣队，一两小时以后才判明炮楼里有敌人，乃以轻重机枪及苏罗通机关炮封锁炮楼的射击孔，并挖地道准备用炸药把炮楼炸毁。关军长闻讯，马上派去几门野炮，命令必须迅速歼灭这股敌人。我军用野炮直接瞄准，很快就把炮楼轰垮。午后四时前后，敌人大部被歼灭，只有十余人突围逃跑。当时我军希望多捉几个俘虏，曾设法追捕。但日军士兵身体素质比我军士兵好，逃得很快，结果只俘获一名负伤的中士。

当郭里集发生战斗时，第25师曾派出一营兵力对枣庄方面警戒。正午前后，枣庄之敌约二三百人，曾企图向郭里集增援，被我拒止。下午三时前后，发现临城、枣庄之大道上尘土飞扬，显然是大股敌人向郭里集前进。军部判断敌人很可能于次日对郭里集一带大举进犯，即命第25师除留一个加强营在原阵地欺骗敌人外，主力撤至郭里集东北山地隐蔽。该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决定第73、75旅各派一个营长指挥两个步兵连及便衣队，统归第150团团长高鹏指挥，在原阵地逐步抵抗，分批后撤。

3月23日拂晓，敌机果然对郭里集一带村庄分批轮番轰炸，上午八时许，敌先用炮轰，继以战车掩护步兵攻击。至十时前后，敌人占领了郭里集一带村落，浪费了许多炮弹炸弹，却扑了空。正午时分，敌机在附近高地上空盘旋，其地面部队约五、六千人向峄县台儿庄方向开去，后来知道这股敌人是以第10师团之濑谷旅团三个步兵联队为基干，加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联队组成的加强旅团，目



标是进攻我军徐州以北运河一线的重要据点台儿庄。

第2师方面，22日夜间奉命向鹁鸽窝前进，因山路行军走了不少弯路，天亮才找到目的地。在听到郭里集方面激烈枪声不久，枣庄之敌派出几十人到鹁鸽窝西南高地构筑工事。我即命第6旅第12团派出一营兵力驱逐该敌，并占领高地，对枣庄方面警戒。

3月23日下午，由台枣支线南下的敌濰谷支队主力逼进台儿庄及运河一线，与台儿庄守军发生前哨战。次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正式向台儿庄发起猛烈进攻，驻守城寨内的我第2集团军第31师池峰城部奋起迎战，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

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支线及台潍公路交叉点，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日军在利国驿一战受挫后，即掉头东进，企图利用枣庄、峄县至台儿庄一带的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一举攻占台儿庄，将运河南北的中国军队截为两段，以便各个击破。因此，台儿庄之得失，已经成为敌我双方夺取这次会战主动权的关键。

在24日的激战中，日军以强大的炮火摧毁台儿庄北部寨墙，有数百名步兵在战车掩护下突入庄内，经我守军勇猛反击，将其全部歼灭。以后一连数日，日军不断增兵，向台儿庄及附近地区猛扑，并几度攻入庄内，均为第31师官兵坚决击退。

正当敌我在台儿庄方面进行激战，日军主力被我第2集团军吸引于台儿庄附近之际，第20军团应该如何行动？

是按原计划攻击枣庄呢，还是转移主力对南犯台儿庄之敌进行歼灭性之打击？根据战区给第20军团下达的“侧击南犯之敌”的基本作战要求，显然应该采取后一措施。假如当时军团以一部分兵力（最多一个师）监视临枣之敌，集中三个师的兵力与台儿庄正面的第2集团军前后来夹击轻敌冒进的敌濰谷支队，则很有歼灭这股敌人的可能。这应当说是一个难得的战机，理应很好地抓住这一战机进行战斗。可惜军团长汤恩伯将军无此决心，也无此打算，仍主张进攻枣庄。在这个作战决策问题上，汤氏是有私心的。有一次他曾私下对第25师参谋长覃异之表示，“敌人正在猛攻台儿庄，看来台儿庄是守不住了，敌人可能比我们先过运河南下。”他的担心是，一旦日军突破台儿庄防线，越过运河，那么远在敌后并与敌主力胶着在一起的第20军团就有遭日军围歼的危险。所以不愿南下拊敌之背，而宁愿进攻对战局并无根本影响的枣庄。后来的事实证明，汤氏对攻击枣庄也不是认真的。

3月26日，我奉命率第2师全力向枣庄外围发动攻击。按作战命令要求，第52军和第85军本应各以一师兵力从东、北两个方向会攻枣庄。但当本师在枣庄以东的开阔地势上艰难向前推进时，第85军只派出一个旅下山配合作战（第85军此时仍在抱犊崮山区），而旅又只派出一个团，团只派出几个排在枣庄外围骚扰一阵后即撤走，使得敌人可以集中全力在城东抵御本师进攻。

第2师在枣庄激战两昼夜，将敌守军歼灭近半，一度占领了大部市区，残敌纷纷缩至城内一隅顽抗。后来有临

城日军千余人赶来增援，与我军在市区内拉锯争夺，演成胶着状态。我因迟迟不见第85军方面的动静，非常焦急，不断向军部催问。关军长要我派人去与第85军联络，但派出几批人连个影子也未找到。关将军对汤恩伯将军也很不满，在电话里向我大发牢骚说：“汤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对我们也玩弄这一手，实在太不应该了！”以后关氏亲派军参谋长姚国俊和第25师参谋长覃异之去军团部见汤将军，也不得要领。

这时，台儿庄方面的战事已处于白热化状态。日军凭借优势炮火，竭尽全力向我军围攻，终于再度从城寨东北角攻入庄内，占据全庄三分之二以上。我守军拚死抵抗，与敌在城寨内展开剧烈的拉锯战，逐街逐屋争夺，最后终因伤亡过大，被迫退至台儿庄西南角的最后堡垒固守待援，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孙连仲将军接连向汤恩伯将军求援，要求第20军团积极行动，全力支援台儿庄正面之防御。

尽管战局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但汤恩伯将军仍无南下与敌决战的勇气。他提出由第52军和第85军各抽出一个团，配属一部分炮、骑兵，组成一个混成旅，向峄县攻击敌之侧背，以应付台儿庄之作战，主力则暂集结于抱犊崮山区，俟看准后再打。这个主张立即遭到第52军一些将领的反对。我们鉴于日军复由临城向枣庄增援，在短期内攻克该城已不可能，提出放弃攻击峄枣之作战计划，以军团主力全力攻击敌之侧背，这样既可减轻台儿庄、运河一线我第2集团军的压力，又可包抄敌濰谷支队的后路，

寻机将其全歼。关麟征将军尤不同意以小部队攻击峰县敌之侧背，主张要打就全力打，不可零打碎敲。其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亦严令第20军团务须以主力迅速向台儿庄之敌侧背运动，不得贻误战机。汤恩伯将军由此才率军南下，对台枣支线敌之侧背展开攻击。

第2军团的攻击部署是：第85军在左（南面），第52军在右（北面）。汤恩伯将军这样部署，是存有偏心的。第85军是汤氏的老部队，所以他处处想使该军在承担作战任务时避重就轻。在攻击枣庄时，第52军由东向西打，面对着临城、枣庄敌之主力，第85军却紧靠着抱犊崮山地。现在向台枣支线攻击，他却把原在北面的第85军南调，左翼依托台儿庄，右翼是第52军，使该军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

当时第52军的兵力部署是：第2师在右，向南北洛、北大窑攻击；第25师（留一个营归军部掌握）在左，向红瓦屋屯攻击，务将敌压迫于台枣支线以西而歼灭之。战斗初期，以25师75旅（欠一个营）为军预备队。

我军南下与敌接触后，即发生激烈战斗，其中第2师在北大窑附近的战斗最为惨烈，敌我都有很大伤亡。日军为保护侧背安全，从台儿庄方面抽出有力部队，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不断向我攻击部队疯狂反扑。我严令各旅必须人与阵地共存亡，不得丢掉一寸阵地。全师官兵士气昂然，全线与敌殊死搏战。战斗最激烈时，敌我双方在阵地上混战一团，展开白刃战，敌人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本师的多处阵地，曾几度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经过反复争夺才稳定下来。一些官兵负伤不下火线，挣扎着

用刺刀、拳头甚至牙齿与敌人厮打，直至壮烈牺牲。战后清理战场时，我们发现不少我军阵亡官兵的尸体与日本士兵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分都分不开。

日军刚刚在台儿庄遭到我第2集团军的顽强抗击，没有想到背后又被中国军队狠狠地插上一刀，实在难于招架。激战两日后，日军死伤枕藉，损失惨重，被迫撤至台枣支线附近。第20军团各军遂全线进逼，对敌形成包围之势，并一度将台儿庄、峄城之交通切断。随后，我奉命率第2师猛攻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要城镇峄县。第25师亦在该城以东地区与敌激战。

当时我军火炮很少，原来配属本师的榴弹炮一营已被第五战区长官部调走，师属炮兵营也大部被调走，仅余一连，其他只有少量小炮，野战尚可，攻城则嫌不足，故而官兵只能凭勇敢和血肉冲锋。

第2师在峄县城东一带与敌反复鏖战，并一度突入城内，但日军依仗其炮火优势，兼以坚固城垣工事为依托，顽强死守，使我军几次攻击均未奏效。

30日上午，我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攻城。激战中，我身边一名参谋人员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反光，被日军发现，立即招来一顿猛烈炮击。有一发炮弹落在我右前方不远处爆炸，我尚未及躲避，便觉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后面两名卫兵急忙将我扑倒，用身体遮护住我。待炮击过后，我奇迹般地发现，除衣袋内的一枚银元被弹皮击弯外，身体居然丝毫未受损伤。真没想到这枚偶然放在衣袋内的银币，竟使我幸免于伤亡。

31日，峰县守敌在我军猛烈进攻下渐呈不支之势。我令全师官兵加强攻势，务求尽快破城。第25师也已逼近台枣支线，即将完成对敌合围歼击的态势。不料这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原在临沂方面与我第3军团庞炳勋部、第59军张自忠部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为解救第10师团的困境，派坂本支队四千余人（步兵四个大队，炮兵两个大队，相当于一个旅团兵力）绕过临沂，突向向城、爱曲一带前进，攻击我第20军团侧背。

在发现向城方面的敌情时，军团长汤恩伯将军恰巧在第52军军部。面对这一突然情况，汤氏显得有些惊慌，拟令第52军转移，以免被敌包围。关军长坚决反对，认为白天于敌前转移部队，容易暴露企图，且因敌机不断轰炸，部队有崩溃的危险。汤将军经过思考，接受了关军长的意见，决定暂置台枣支线敌人于一边，集中军团主力迎击敌坂本支队。

我军的部署是：第25师于31日晚脱离战斗，迅速往后转移，在兰陵镇以北迎面阻击向城方向突进之敌，第4师由甘露寺地区转移至秋湖、爱曲，协同第25师向敌展开包围；第89师由向城附近，开抵洪山镇以东地区，掩护第25师侧背；第2师由峰县以东撤至北大窑附近，依托山地掩护军团主力行动，并监视台枣支线敌人的动向。稍后，新增援第五战区的第75军周舜部也奉命归第20军团指挥，部署在岔河镇、大良壁一线。

3月31日晚，敌坂本支队在兰陵镇西北地区遭到第25师75旅的迎头痛击。不久，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率第

73 旅亦赶到，马上投入战斗。坂本支队急于同濑谷支队取得联系，无心恋战，除留一个加强中队约数百人担任掩护外，主力绕过兰陵镇，到达该镇以南、台枣支线南段东侧的杨楼、底阁一带，与第 10 师团部队会合在一起。我第 20 军团主力跟踪而至，重新将这股敌人包围在杨楼、底阁地区。同时，第 25 师 145 团在炮兵支援下，经一昼夜战斗，将敌掩护部队全歼于兰陵镇西北的傅庄。

在军团主力与敌坂本支队交战时，峰县之敌乘机反扑，同第 2 师发生激烈战斗。我指挥部队利用北大窑一带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竭力避免我军腹背受敌。

某晚，军团长汤恩伯将军来到我的师部视察，决定打击峰县之敌以免除后顾之忧。他命第 89 师接替第 2 师阵地，抽出第 2 师乘夜色绕出敌后，迂回攻击峰县之敌。汤氏这一着，又一次暴露出他的私心用事。按一般军事常识，第 89 师开到后直接插入敌后甚为便当，汤氏却偏偏不怕麻烦，硬要两师换防，意在让第 2 师承担更为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第 89 师于当夜接替阵地后不久，即被日军冲垮，该师师长张雪中将军连连向汤将军告急，汤氏只好下令第 2 师迅速回援。我接到这项新的命令时已是深夜，各团均已奉命分开活动，我和参谋长费了很大气力才将部队收拢在一起，待赶回北大窑附近时已是次日天明。在通过一片丘陵地带时，敌人的飞机不断向我军扫射、轰炸，企图阻止本师与第 89 师靠拢。我一面组织轻重火力对空射击，一面命令部队利用地形隐蔽，分散向前跃进，交替掩护，所以没有受到大的伤亡。

本师与第 89 师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日军两面受敌，招架不住，重新缩回峰县附近。汤将军看到第 2 师冒着敌机的轰炸赶回增援，部队居然毫不混乱，大为高兴，对我一再称赞：“你的部队不怕敌人的飞机，了不起，了不起！”汤氏身边的一位幕僚事后对我说，汤先生是在南口战役中被日军飞机轰炸吓坏了，见到敌人的飞机就头疼。看见有的部队能在敌机的轰炸下安然行动，自然觉得有些惊奇。

第 2 师击退峰县之敌后，又奉命转移至甘露寺以西，会同第 25 师主力对盘踞在杨楼、底阁一线的坂本支队展开猛烈攻击，第 85 军、第 75 军亦在大良璧及岔河镇各南北之线与敌对峙。

日军虽为我军包围，犹作困兽之斗，凭借村寨顽强抵抗，多次向我反扑。第 25 师 146 团营长曹云剑阵亡，攻击一度受挫。第 85 军、第 75 军方面亦无进展。

大约是 4 月 6 日，第 52 军奉命再兴攻势，不惜代价地猛烈冲击敌阵，经终日激战，大败敌坂本支队主力，从根本上解除了日军对军团侧背及台儿庄东北方面的威胁。随后，第 20 军团复全力向台枣支线之敌进迫，并与据守台儿庄之第 2 集团军部队会师，对敌濑谷支队等部形成内外夹攻之势。此时，日军经十余日殊死鏖战，已是人困马乏，弹尽油绝，全线发生动摇，有北撤迹象。

4 月 6 日夜间，日军突然向第 52 军阵地疯狂反扑，战斗异常激烈。根据以往经验，敌人很少夜间攻击（因其夜间不能利用空军优势），我们分析当时情况，判断这可能是



敌人撤退前的反扑。因第52军对敌之侧背威胁最大，非打击第52军，其退却不能安全。军部也认为这是敌人退却之徵候，于是自军长关麟征将军以下军师将领，均亲赴前线指挥，鼓励各部坚决固守，并乘机反击。深夜，敌濰谷支队果然沿台枣支线仓皇北撤，敌坂本支队残部也随后向峰县东北地区溃逃。我军士气大振，遂发起全线反击，台儿庄守军亦从庄内杀出，与我部齐头并进，向北追击。一路上，敌人焚毁的战车、遗弃的军用物资和已焚化的阵亡日军尸骨随处可见。我们一直追击到峰县附近，因敌人已在峰县附近高地占领阵地乃止。这就是抗战前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是役，我军共歼敌一万余人，这是继平型关战役以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有力挫败了日军一举攻取徐州，再迅速进军武汉的战略企图，为我军准备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由于日军号称精锐的第5、第10两个师团，一挫于临沂，二阻于滕县，三败于台儿庄，其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大大振奋了前线将士和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第20军团追击日军至峰县后，因敌坚守不动，遂以小部队监视日军，主力进行整顿。第52军驻于峰县以东地区，第85军驻于峰县东南地区。

两日后，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各部队对峰县附近之敌发动攻击。攻击部署大致是：第20军团由东向西进攻，第2集团军由南向北进攻。第20军团以第52军由东向西，第85军由东南向西北，形成包围攻击之势。第52军的部署

是：第2师在左，向九山及其以南攻击；第25师在右，以主力（三个团）向九山以北各村庄之敌攻击。留一个团为军预备队。

九山是峰县城附近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全局，为最好的炮兵观测所。夺取九山是第52军由东北面进攻峰县的重要步骤。

第2师第一天就攻击至九山脚下，但日军凭险据守，弹如雨下，使我军无法接近。我仔细地观察了九山的地形，觉得这座光秃秃的石头山确实险要，而且敌人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如果白天强攻牺牲一定很大，遂与参谋长舒适存计议，决定改强攻为智取，拟采用“精兵夜袭”的办法来夺取九山高地。

当晚，我们挑选了约一营精壮士兵，配备了短枪、刺刀和手榴弹，悄悄潜伏于九山脚下。午夜以后，我见九山日军阵地上没有动静，估计敌人都在睡觉，即命开始行动。

我军士兵悄悄摸上山去，敌人一点也未察觉，行动非常顺利。突击营爬入敌人阵地后，士兵们纷纷将一束束预先准备好的手榴弹投入日军休息的碉堡和工事里。从山下望去，只见敌人阵地上火光闪闪，轰隆隆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不少日本鬼子在睡梦中就被送上了西天。日军未料到我军会发动夜袭，显得惊慌失措，几乎来不及组织抵抗，九山阵地就被我突击营占领了一半。我军第二梯队趁势冲上山去，与敌激烈争夺，拂晓前即将九山阵地全部拿了下来。防守九山的日军大部被歼灭，只有少数敌人丢盔卸甲地逃至峰县北关附近。

九山之占领,对我军以劣势炮兵对敌优势炮兵之战斗,起很大作用。为了便于指挥,我将师指挥所移至九山山下,督促各旅继续向敌攻击。

第85军方面经两日战斗却无多大进展。汤恩伯将军似乎觉得面子上不好看,便将责任归咎于第2集团军,说孙连仲将军的部队没有如期攻下獐山(獐山于4月13日才被我军攻下),第85军受到獐山敌炮的威胁,所以进展缓慢。

据说九山比獐山难攻,第2师竟然一举攻下九山,使关麟征将军大为高兴,亲自来九山阵地视察。他带的随行人员较多,结果暴露了目标,惹来敌人炮轰,我方炮兵亦予以还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一时炮声隆隆,九山顶上山石横飞,虽未造成什么伤亡,但不少人的衣服都被碎石片划破了。黄昏前,九山南端距峰县城北关不远的一个小村落,也一度被第2师占领了。

第25师方面,经过几天激战,相继占领了九山以北的几个村落,使敌侧背受到很大威胁。日军抽出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对第25师发动多次反扑,均被击退。

4月中旬某日下午,日军由税郭方面对第25师右翼之第145团1营三面包围攻击,该营阵地被突破,第25师右翼因此受敌反包围。该师全力反攻,经过三小时苦战,右翼阵地始稳定下来。黄昏前后,该师侧背又发现敌人的增援部队,炮弹不断落到师指挥所周围,情况紧张。当夜,第25师奉命转移至九山以东,与第2师阵地衔接,构成由南向北的战线。事后,关军长追究这次作战不利的责任,枪毙了第145团1营营长奚濯之以示诫全军。

这期间，第2师会同友军，几度攻击峰县城，但日军龟缩在城内死守待援，我军攻击均未奏效，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4月中旬以后，战场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日军经台儿庄一役的惨败，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精锐军队，若不增调重兵，则无法打通津浦线，攻下徐州。于是，日本大本营决定其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协力作战，先后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余个师团，共三十余万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徐州，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徐州战场中国军队主力。仅在津浦路北段，日军第5、第10师团就得到了第16、第11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5旅团十余万兵力的增援，峰枣之敌由此转守为攻，这一线之我军则被迫转入防御作战，战局对我日渐不利。

4月17日，第52军奉命放弃攻击峰县的企图，向邳县以北之艾山、连防山、燕子河之线转移，防御正面攻击之敌。

敌人的动作很迅速，我军刚一移动，就遭到日军的堵截和追击，不得不且战且退。第2师在转移途中，前卫第4旅首先与截击我军的一股敌人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很快将敌击退。不多久，后卫第6旅又与尾追之敌交上火，一直打到傍晚才摆脱了敌人。我们趁敌人尚未合围，很快从日军的缝隙中钻了出去，与第85军会合，一起向后方转移。

当晚，我们就宿营在台儿庄西北的一片山地中，我的师部驻在一座山的山脚下。夜里一股日军不知怎么又跟踪摸上山来，袭击我军，与担任警戒的师骑兵团部队激烈交

战，一时枪声大作，约个把钟头后始将敌人击退。此后倒再未受到敌人袭扰，部队于次日顺利到达指定阵地。

第52军转移至邳县以北，在艾山与燕子河之间占领阵地后，即积极构筑工事，准备御敌南犯。军的兵力部署是：第2师在右，其右翼在燕子河，左翼在连防山正南的大刘庄与第25师衔接，重点保持在右翼；第25师右翼与第2师衔接，左翼在艾山以北之虎皮山、艾山西等处。第25师75旅150团在连防山占领前进阵地（艾山、虎皮山东北）。卜福士山炮在艾山南无名小河南岸（沿河有稀疏树林）分散放列；野炮在更后方分散放列。观测所设于艾山，这是全军阵地的最高点，高约一百五十米至二百米。

连防山是一个有千户左右人家的大村落，位置在我军阵地之正前方，守住这个村庄，全军阵地都得到掩护，实为我主阵地的重要前进据点。村庄周围有残破的土围墙，并有稀疏树林，对敌方面是一片开阔的麦田。在这里倘能认真构筑工事，至少可以支持几日。可惜第150团团长高鹏麻痹大意，以为敌人一时不会来犯，拟休息一日再构筑工事。不料第二天晨八时，敌机即轮番轰炸，继以炮击，步兵从三方面向该团进攻。第150团仓促应战，因无工事依托，不到三小时阵地即为敌突破，官兵伤亡很大。关军长和第25师师长张耀明闻讯亲自赶到艾山督战，曾由虎皮山方面派出部队向敌侧击支援该团，因敌机轰炸，未能奏效。

这时高团长退到连防山南端，正在收容败退下来的官兵。关军长因这处重要阵地竟轻易失守，十分恼怒，严令他迅速反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高鹏无奈只得硬着头

虎皮收拾残部反攻，不到一小时即中炮牺牲，队伍重又垮了下来。关氏无计可施，遂命第2师派一个团加强大刘庄之防务（该处阵地原属第25师，后移交给第2师），同时命令炮兵火力及虎皮山、大刘庄两地火力压制连防山之敌，使其不得继续前进。

连防山阵地丢失后，我军主阵地暴露在日军面前，敌机连日在我阵地上空盘旋侦察。军部判断，虎皮山可能是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因虎皮山与艾山连接，是全军阵地之锁钥部，敌人势在必得。

守半步店子、虎皮山、艾山西等地之第73旅，日夜加强防御工事。由于这一带都是石头山，构筑掩蔽部用的泥土都要由山下运上来，非常吃力。但鉴于上次教训，官兵们不敢再有丝毫马虎，千方百计地加固阵地。经两昼夜之努力，防务大大加强。

第三日，日军果然向虎皮山大举进攻，敌步兵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逐步接近我军阵地。在敌机轰炸和炮击时，我守军除少数在阵地上监视敌人外，都进入掩蔽部，俟敌步兵接近我军前沿阵地，即跃入工事，以轻重武器猛烈扫射，同时派出小部队由两翼侧击，给日军很大杀伤。当天敌人的两次进攻，都被我军坚决击退了。

第一天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为了避免第一线部队过度疲乏，第25师以营为单位，二十四小时轮换一次；使官兵的士气始终饱满，这对于持久防御非常有利。

翌日，日军以一部向虎皮山佯攻，主力绕攻艾山西，企图从侧背切断艾山与虎皮山的联系，战况较前一日更为激

烈。两军相持之际，第75旅149团团长刘世懋派出部队主动出击，由侧背抄袭进攻之敌，日军猝不及防，遭到很大杀伤，又垮了下去。

日军白天攻击屡次受挫，军部判断敌人可能进行夜间攻击，命令各师旅做好夜战准备，连日在阵地上布置夜间射击设备。4月27日，日军果然利用夜间，以一部攻击半步店子，主力分股冲上虎皮山。我军虽有准备，但敌人来势很凶，战斗异常激烈，半步店子被敌人占领了一部分，双方展开巷战。虎皮山向敌之斜面，亦为敌所占领。根据当时情况，我军必须在天明前将阵地前的敌人消灭掉，否则天亮以后，敌人得到飞机、大炮的支援，对我军很不利。因此，凌晨二时前后，第25师在炮兵支援下组织了有力的反击。我军在近距离用手榴弹及60迫击炮，山脚至山腰用82迫击炮，更远之处用卜福士山炮及野炮，由近到远构成浓密火网，同时倾泻在敌上头上，随即从正面及两翼派出少数部队向敌人袭击，两个小时内即将敌人完全击垮。

天亮时，阵地前敌人遗尸甚多，日军用炮火封锁，飞机亦在空中盘旋扫射，阻碍我军清扫战场。半步店子之敌仍占据着几个独立房屋，顽强抵抗。第25师判断敌人第二晚可能继续攻击，也可能以攻击掩护其搬运尸首。黄昏前后，该师派工兵在虎皮山一带阵地前沿悄悄埋下不少地雷，并加强侧防火力。

不出我军所料，天黑后日军果然来犯，在我军阵地前沿就遭到很大杀伤，我军乘夜把半步店子之敌驱逐了出去。这一晚战况没有头一晚激烈，天明前敌即退去。次日，日

军继续用炮火封锁，并有飞机监视，我军仍无法清扫战场。那时鲁南、苏北地区的气候已非常炎热，阵地上的死尸因不能运走，都腐烂了，臭气难闻。但自此以后，日军未敢再进犯虎皮山。在这次战斗中，从俘获敌人的文件中得知，连日进犯之敌是日军第10师团的部队。

日军进攻虎皮山受挫后，停止了两日，即转移其攻击目标于第2师方面，企图从大刘庄对我阵地实行中央突破。几日来，第2师之防御工事不断加强，村与村之间构成交叉火力，并有交通壕连接。大刘庄阵地前面是一片开阔麦地，颇利于发扬火力，且可得到虎皮山、半步店子方面火力之支援。

5月1日，日军出动数百步兵在飞机、大炮优势火力掩护下对我大刘庄一线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抗击，并不断以小部队抄击敌之侧背，日军伤亡很大，被迫溃退下去。隔了一日，日军利用夜色再次接近我军阵地，悄悄潜伏起来，拂晓时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突然向我军发动冲锋，势头很猛。我守军集中各种火力向进攻之敌迎面猛扫，敌人在阵地前死伤枕藉，但攻势未曾稍减，两军在阵地上展开白刃战，杀声震天。这时日军的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我军因人数占优势，渐渐占了上风。激战至午，敌人被消灭大半，其余的都仓皇退了下去。后来查明，进攻第2师阵地之敌是日军第5师团之坂本旅团。

我根据第25师的经验，以团为单位，每经一次战斗之后即轮换一次，故部队始终保持着锐气。

日军从正面攻击一再失败，停顿两日，改向本师右翼



攻击。经一日之激战，大刘庄东边的一个小村庄（一个营防守）失守了。次日，敌人从三个方面向大刘庄攻击，守军第7团奋力抵抗，战况异常激烈，敌我均有重大伤亡。激战中，团长刘玉章负伤，仍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我军阵地始终屹立未动。

日军的攻击虽连遭顿挫，仍不甘心，潜伏在我军阵地前的麦田里，并构筑工事，伺机再犯。我感到让敌人停留在阵地前对我军是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消灭他们。入夜，我抽出师预备队一部，配合第7团从两翼出击，一举将敌击垮，击毙日军甚众，阵地前仅日军撤退时未及运走的尸首就有一二百具。经此几战，日军遂不敢轻举妄动，以后除零星炮战外，敌人再未向第52军阵地进犯。

当大刘庄东边的小村庄被敌攻破时，第2师曾几次反攻，都未奏效，部队且有相当损失，我决定暂时作罢。但关麟征将军却大发脾气，一定要第2师把这个小村庄夺回来。我反复向他解释，这个小村庄之失，对全师阵地并无多大影响，而且已经几次反攻无效。根据以往经验，攻击敌人占据的村落，每每要遭受很大伤亡（第150团反攻连防山所受的损失便是一例），第2师经连日战斗伤亡甚大，不能再浪费兵力去反攻一个关系不大的小村庄了。但这些话关氏根本听不进去，竟在电话里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我历来看不惯关氏的蛮横作风和自私心理，特别是这次连防山以南之大刘庄，本该属第25师防守。因为第25师防御正面较小，且有虎皮山的有利地形，可以节约兵力。而第2师在平地，防御正面宽广，右翼无依托（燕子河可以徒涉，

不能成为障碍)。当时把大刘庄防务划归第2师时，我就觉得关氏有偏心，现在为一个小村庄的失守，他却如此过分责备。再联想起以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心中更为不满，以后干脆不去接他的电话，由参谋长舒适存去与其打交道。从这时起，我即有了不愿再与关氏共事的打算。

自3月中旬开赴鲁南以来，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作战，第52军两个师都有很大伤亡，特别是第2师，因接连打过几场硬仗，损失更大，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人数的一半。5月上旬，第五战区长官部调第2军接替第52军的防务，让我们这支疲惫而残破的部队开往徐州附近待命，5月13日又奉命开归德整补，从此便结束了在徐州战场的作战任务。

这时徐州战场的形势对我军已极为危殆。尽管第52军与友军（第2集团军、第22集团军、第51军、第60军、第92军等部）在韩庄以南运河沿线及邳县以北艾山、连防山、燕子河一线与日军激烈鏖战二十日，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却未能扭转战局。相反，由于我军主力部队均在第一线阵地与敌胶着，由原来的外线机动作战转为单纯的阵地防御战，逐渐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5月中旬，日军第6师团攻陷合肥，解除了其华中派遣军主力北上的侧背威胁。日军第9、第13师团主力亦沿涡河两岸及北淝河向蒙城前进，相继攻陷蒙城、永城等重镇。随后，该敌一部经韩道口突袭黄口，切断了陇海铁路，另一部由百善北进，进至徐州西南四十余华里的肖县地区。同时，苏北日军第101师团等部已陷高邮、宝应，进迫淮阴，

并以一部攻陷盐城、阜宁，积极向邳县西进，以包抄徐州。在津浦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6师团于5月中旬攻陷鱼台、金乡，17日占领丰县。日军第14师团也于11日夜由濮县附近渡过黄河，连陷郛城、鄆城、菏泽、曹县，进逼兰封，切断了我第一、第五战区的联络。在运河以北正面的日军一部主力绕过台儿庄及运河以西，渡过微山湖向沛县进攻，于18日占领沛县，其先锋距徐州城仅十余华里。

至此，徐州已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我陆续增援至徐州战场的六十万大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鉴于战局急转直下，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徐州，命令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分向豫、鄂、皖地区转移。

这时我率第2师已撤往归德，事后得知我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行动迅速，利用日军合围阵容混乱，以及地形不熟悉，夜间不敢作战的弱点，昼息夜行，分别自日军的间隙中巧妙通过，安全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其中，孙连仲将军指挥的鲁南兵团（徐州会战后期，第一、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划分为陇海兵团、鲁南兵团、鲁西兵团等三个野战兵团）由徐州南面突围，经灵璧、泗县、五河渡淮河向西撤退；第五战区长官部和汤恩伯将军指挥的陇海兵团主力放弃徐州，向南撤往宿县，因宿县已失守，陇海兵团乃向西突围，由亳县、涡阳附近渡过涡河西撤。长官部则在我淮北兵团接应下在太和、阜阳地区突出重围。5月19日，日军终于占领徐州，但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敌人企图在徐州战场围歼我野战军主力的计划，完全成为

泡影。

这里要补述一件事：第2师由峄县转到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之初，参谋长舒适存向我提到，我军阵地后方有运河之阻，仅靠铁道桥交通，不单人马通行不便，一旦被敌机轰炸，危险更大，应及早采取相应措施。根据他的建议，我命令师属工兵连星夜驰赴碾庄圩东侧，架设浮桥，以能通过人马及载重汽车为度。该连以一昼夜的时间，就地征集民船木材，使用木船连结，上铺垫粗厚树条及木板，加盖泥上，使车马通行无阻。没有想到，徐州会战末期，我军在运河东北地区的主力部队，有十余个师赖此桥而得以撤出徐州战场。可见大兵团作战，战地交通至为重要。追忆此事，亦感叹舒氏之功不可没矣。

徐州会战是我国抗战初期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虽然以日军占领徐州、中国军队遭受失利而告终，但由于广大抗日官兵的浴血奋战，还是给予了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从1937年底至1938年5月，我军在津浦路南北两段与几十万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精锐部队整整周旋了五个多月，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军队的抗战士气，也为大后方部署对敌持久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应当指出，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战略运作上有了很大进步。会战前期，我军利用敌人的骄傲心理，大胆采用攻势防御战略，以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有计划地使用优势兵力，对津浦路北段轻敌冒进之敌予以果断的包围攻击，遂有台儿庄之捷。可惜由于汤恩伯将军的犹疑，拖

延了第20军团南下抄击台儿庄之敌的时间，待军团南下后，又受到临沂增援之敌的纠缠，以至未能全歼该敌。倘第20军团早一步南下，与台儿庄及运河沿线的第2集团军前后夹击孤立无援的日军濑谷旅团，则极有可能取得更大战果。尽管如此，我军当时的整体部署还是正确、积极的。较之抗战之初，我军在华北和淞沪战场采取的将主力部队配置于既设阵地，与优势敌人死拼的消极防御战略，台儿庄战役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指挥系统不统一，各军队派系间互不协调、各图自保，是当时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之一。就我所经历的1933年长城抗战之役，以及抗战爆发初平汉路北段的保定之役来说，我军失利无不与此有关。但在徐州会战期间，我军却能较好地克服了这一弱点。会战前期我方参战部队仅第20军团为中央军，装备尚好，其他部队不仅装备、战力相差悬殊，有的彼此间还有宿怨。但在作战中却能服从指挥，相互配合，使敌无隙可乘。如张自忠将军与庞炳勋将军在以往的内战中曾结下很深的私怨，但当庞部在临沂孤军奋战、形势危殆之际，张将军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毅然率部往援，与庞部合力击溃进攻临沂之敌，一时传为佳话。即使在会战末期，我几十万大军已处于敌人合围之中，各部仍能按着统一部署，有条不紊地撤出徐州战场，与我军在淞沪战场撤退时的混乱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究其原因，除了战区长官公正、有力的指挥外，在当时举国同心、一致御侮的形势下，我军自高级将领到一般士兵，均有强烈的抗敌意识，对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已远远

超出个人或集团间的利害冲突，故而能在强敌面前团结一致，共同奋战。再者，会战初期，最高统帅部下令枪毙了率大军临阵逃脱的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对我军诸将领震动很大，以后高级将领中鲜有敢违令擅自弃地不守者。即使作战不力，有消极避战表现的将领，也受到了严肃制裁，如第32军黄光华师长在作战中裹足不前，坐视友军危殆而不救，结果被撤职查办。由于军纪严明，各部畏于军法，只能力战抗敌。

当然，徐州会战期间，我军在兵力部署调配，以及作战指挥方面的失误也是不少的，有的还属于战略性的错误。如我军在台儿庄击溃日军后，本应乘胜横扫峰枣之敌，但战区和前线指挥官均满足于已有胜利，未尽全力进攻峰县，反而让前线各部队在峰县外围休整了两天，结果使敌人站稳了脚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战机。以后日军得到增援而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军乃陷于被动之中。再如会战第二阶段，我最高统帅部因台儿庄获捷而振奋，陆续增调几十万大军源源开赴徐州战场，企图扩大战果。但这些部队大多被派往韩庄以东运河沿线和邳县以北之艾山、连防山、燕子河一线等阵地与敌对峙，使我野战军主力陷于第一线之阵地战，战区长官部无法集中掌握强大的打击兵团，保持外线机动作战的有利态势，反而使自己内线应敌，四面招架，遂由主动转为被动，最后险遭敌人围歼，幸亏我军撤退及时，主力未受损失，否则会给后来的抗战造成难以想像的后果。

### 三 从徐州撤退到武汉会战前后

第52军奉命从邳县以北之燕子河、连防山、艾山第一线阵地撤出后，即徒步向徐州开进。行军序列是第2师在前，第25师在后，彼此相距约一天路程。

本师行至邳县，即与苏北突进之敌相遇，发生激烈战斗，苦战大半日始摆脱敌人。那时我们已与敌人血战了近两月，人员消耗过半，部队疲惫不堪，撤退途中若与敌人主力部队胶着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从邳县到徐州约有一百五十余华里的样子，我们昼息夜行（躲避敌机轰炸），走了两天方赶到徐州。记得本师到达徐州城外时，天色尚早，我命部队在东门外的一大片坟地中休息，自己准备进城去长官部晋见李长官请示机宜（这时我们已接到开往河南整补的命令），并顺便了解一下战场情况。尚未动身，敌机四五十架即呼啸而至，猛烈轰炸徐州城。不多时，城内硝烟弥漫，大火冲天，许多市民争相向城外逃命。本师官兵因分散隐蔽在城外的坟地里，幸未被敌机发现，故未受到任何损失。敌机离去后，我见城内一片纷乱，遂打消了去长官部的念头，率部沿陇海线以北向西徒步行进。

走到杨山附近，我们与南渡黄河的一小股日军遭遇，遂

将其击退，也未追击，继续赶路。第二天，又碰上另一股日军，仍是将其打退后就走，不想恋战，因为我们随时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

这时，日军土肥原师团（第14师团）主力已渡过黄河，大举南下，企图在东路第16师团的配合下合击我置于陇海线东段兰封、归德砀山之间的鲁西兵团，遂又有兰封战役。

第2师到达归德时，兰封战役尚在激烈进行，我军一部主力正向仪封、内黄地区攻击日军土肥原师团；另一部主力则在砀山、归德地区与敌第16师团激战。我一到归德，鲁西兵团指挥官薛岳将军即召我前去，详细询问了徐州方面的作战情况，并命我将部队暂控置在归德附近，作为兵团的预备队。

我们在归德以西地区逗留了几日。这时东路日军攻势猛烈，相继攻陷砀山、归德等军事重镇，沿陇海路直逼鲁西兵团侧背，使我军围歼敌土肥原师团的计划落空，被迫向平汉线以西地区转移，第2师则奉命先行撤到漯河整补。

6月初，豫东战局继续恶化，日军土肥原师团发动反攻，先后占领兰封、开封，第16师团亦攻占尉氏、扶沟，步步进逼郑州和平汉线。为阻敌前进，我最高统帅部竟决定以水代兵，下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洪水泛滥。这个行动虽然暂时遏制了日军西进平汉线的势头，却使豫、皖、苏三省的广大地区尽成泽国，数百万人民丧失家园，流离失所，饱受灾难之苦。应该说，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豫东日军被迫后撤后，我军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乃抓紧部署，准备抵抗日军下一步对武汉的进攻。6月10日



前后，第2师又奉命与第25师会合，经河南南阳、湖北随县、安陆向鄂东地区转移。

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拟让我任副军长，但不再兼第2师师长。我深知关氏用心，他将军长职务交给他的同乡（关、张二人同是陕西人）、老部下张耀明，可以保持其老班底，同时让我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副军长，又可乘机削掉我的兵权。我与他本已有隙，此次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北伐以来我就在第2师中服役，南征北战前后达十余载，此番离去，心中颇感凄凉。

第2师中不少军官亦对关氏为人反感，故我离开第2师时，不少人含泪相随，后来我在第5军任荣誉第1师师长时，又有一批军官离开第2师，赶来与我共事，如参谋长舒适存，参谋主任赵霞，团长汪波、吴啸亚等，此为后话。

我在长沙仅住了很短一个时期，这时我的女儿风云正准备结婚，我因赋闲无事，遂赶回家乡参加她的婚礼。自投笔从戎以来，除了第一次东征战役结束后，我曾请假回乡小住外，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故里。离乡多年，不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无比亲切。家乡父老对我十分敬重，接连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我，使我应接不暇，这真诚、凝重的乡情，竟一扫我离开部队以来的不快情绪。

风云的婚事操办完毕后，我于8月中旬奉召匆匆返回鄂东，在汤恩伯将军身边任参议（时汤部番号已改为第31

集团军)，此时武汉会战正处于激烈阶段。

先是，日军自攻占徐州后，即以四个师团之众沿陇海路西犯，准备夺取郑州、开封，再南下信阳，与使用在长江方面的第11军主力会攻武汉。敌人的战略企图仍是“速战速决”，迅速击破中国军队主力，攻占我国核心城市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后因我方在黄河花园口决堤，逼退豫东日军，此路日军乃相继南调，以主力沿长江西进，攻取安庆、潜山、太湖，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同时，原在南线的日军第11军共五个半师团，亦积极进犯黄梅、九江，再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由此形成对武汉的合击之势。敌人的进攻重点在长江以南，以北、东、东南三面合击我野战军主力。

根据敌人的进攻态势，我最高统帅部确定以长江以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和长江以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共同参加武汉会战。我军作战的指导方针是，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为目的，重点立于外线，在豫、鄂、皖、赣诸省广大区域，节节抵抗，不断消耗日军，争取以空间换取四至六个月的时间。我军的防御重点保持在长江以南。据此，第九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命防守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阻敌南犯；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将军）防守德安至九江一线阵地。第五战区的第3、第4兵团（司令分别为孙连仲将军，李品仙将军）则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一线防御。

我回到第31集团军不久，我军即弃守九江以西之瑞昌，节节抵抗西撤。第31集团军在码头镇、富池口一线猛

烈抵抗西进日军，这两处沿江要塞于9月下旬相继失守后，集团军被迫退至富水河南岸继续阻击敌人。薛岳兵团仍在德安一线与敌相持，战局相当吃紧。某日，汤恩伯将军派我前往前线第37军督战。该军军长恰是我过去的老上级、北伐时被蒋先生撤职的旅长黄国梁将军。自那时别后，我们彼此再未通音讯，想不到在这里相见了。黄氏待我格外亲热，指挥余暇，便与我天南海北地闲聊，有时谈到深夜，二人便抵足而眠，情同手足。过了些日子，汤将军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指责黄将军指挥无方，所部战绩不佳，要我取代他的位置。这时我才明白汤氏当初派我到此督战的真正用意。对他的一番好意，我当然心领，但黄将军是我过去的老长官，且此次相见以来，对我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我怎么能忍心夺他职位？况且我受传统礼教影响颇深，纵然万死，亦不愿担此暗算朋友之嫌，所以便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汤将军的提议。我担心再呆在这里还会节外生枝，故赶紧寻了个借口，回到集团军司令部。黄将军始终被蒙在鼓里，见我匆匆返回，还一再挽留不舍呢。

事后，汤将军身边的一位幕僚不知如何知道了此事底细，某次曾私下半开玩笑地同我说：“你老兄放着军长不去做，还跑回来做这个光杆参议，为人也未免太迂了。”我闻言一笑置之。以后想起这件事，我始终不悔。忠诚老实四字，是我一生为人的信条。

10月下旬，德安终于失守。在此稍前，日军已相继攻克半壁山、阳新、大冶等地，分兵三路向通山、咸宁、贺胜桥前进，意在截断粤汉线，我长江以南各军相继退却至

武宁、通城、岳州一线。同时，长江以北的日军也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其主力转沿平汉线南下，连陷武胜关、平靖关等要隘，兵锋直逼汉口以北。这时武汉以东之商城、麻城等地先已失守，外围屏障尽失，处于日军北、东、东南三面包围之中，我最高统帅部乃下令放弃武汉，全线撤退，武汉于次日失陷。

武汉会战是我国抗日战争中规模空前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役我军先后投入一百二十余个师，一百万以上兵力，日军也陆续投入十二个师团以上，近四十万之众，双方在豫、皖、鄂、赣四省广大区域激烈鏖战达四个半月之久。其间日军伤亡达二十万人，占其参加此次作战的总兵力的一半，我军伤亡则倍之，由此亦可见战争的剧烈程度。尽管日军最终占领了武汉，但并未达到其速战速决，以夺取武汉来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的。相反，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且消耗过大，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积极袭扰敌人，使日军一时无力再对我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失守以后，第九战区主力撤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与敌对峙。第31集团军奉命开到湖南益阳一带休整。

过了不久，我接到去南岳衡山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的通知，便带了随身卫士文健，经岳州、长沙赶往衡山。没有想到，我们到达长沙的当晚，就遇上了轰动一时的长沙大火。

我是11月12日下午到达长沙的，住在市内北长街路

西的第31集团军办事处，准备第二天继续赶路。次日大约凌晨二时许，我尚在酣睡中，忽被人用力摇醒，见文健立在床边，急促地说：

“师长（部下仍这样习惯地称呼我），快醒醒，城内起火了，我们得快走！”言毕又匆匆跑到外面察看情况。

我听到城内起火的消息先是一惊，随即想到前线距长沙尚有三百余华里，敌人不可能这样快就打进来，也许是居民不慎酿成的火灾。这样想着，也就安下心来。

稍顷，文健又跑进来，见我仍坐在床上从容地穿衣，急得大叫：“哎呀，师长，请您快些吧，大火都快烧到门前了，我们必须马上走！”说完三下两下打起铺盖，一手扛在肩上，一手拉着我往外闯。

来到门外，我方感觉到情况确实严重，此刻城内到处燃起熊熊大火，连我们办事处对面一马路之隔的建筑物也燃烧起来。远处一座军火库正在发生猛烈爆炸，“噼里啪啦”地响成一锅粥，街上的老百姓惊惶失措，哭爹喊娘地争相奔往城外逃命。我们只好随着人流往外走，但大火已将许多道路封死，情况极为混乱，文健拉着我左弯右拐，好不容易才绕出北门。

出了城，稍缓了口气，才发现周身已被汗水湿透了。回头望去，长沙城一片火海，火势愈来愈大。我还很镇静，心中盘算，这场大火看起来虽非一般火灾，但不可能是日军逼进造成的，恐是敌人利用汉奸搞破坏，制造混乱。因此决定先留下不动，看看情况再说，遂在附近一户百姓家中借宿，休息了几个钟头。

翌日天明，我带着文健重又进城去，只见城内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不少建筑物还在继续燃烧。走不多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乘车迎面而来。他们都认识我，故见到我即将车子停到路旁，一起坐在一户民房的残墙断壁边谈话。酆氏一脸焦灼不安的神色，问我：

“洞国兄，你知道昨夜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我昨天刚刚到这里，哪里晓得，正要问你呢！”我又可气又好笑，心想你们负责全城治安，出现这样大的灾变竟毫不知情，倒来问我一个过路人。

我们略谈了几句，酆悌他们有事，即登车匆匆而去。当时陈诚将军也住在长沙，晚上我去见他，他也不清楚昨夜的情况，见面就问这场火灾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自己只是路过长沙，一点不了解情况。陈将军在房内踱来踱去，显得十分焦躁，临别时吩咐我赶快去查一下，向他报告。以后我急于去衡山开会，同时听说中央已着手调查，故于次日就离开长沙去衡山了。当时大火虽已熄灭，但长沙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少百姓结队向后方逃难。我乘车南行，沿途见灾民们扶老携幼，推车挑担，艰难地行进着，刚行至湘潭，江边渡口早已挤满灾民，我足足等了半日才渡过江去。

长沙大火是一场浩劫，一夜之间几乎全城人民的房屋财产统统化为灰烬，并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此事引起的震动极大，各界纷纷要求调查事件原因。但是，后来调查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我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场不幸的灾变竟不是出自敌人的破坏，而是我们自己人造成的。原来，

自武汉陷落后，最高统帅部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要攻取长沙或南昌（以后敌人确向南昌进攻），乃指示湖南地方军政当局，长沙万一不能守时，即实行焦土抗战，将全城焚毁，免资敌用。但是，受命执行这项任务的保安团士兵因缺乏训练，事前准备不周，听到敌人逼近长沙的谣传后，不待发出警报即在全城放火，以致酿成惨祸。事后，蒋介石先生亲到长沙视察，下令枪毙了在此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并指示采取措施安置灾民，局势才渐渐安定下来。

11月25日至28日，蒋先生在衡山亲自主持了重要军事会议（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参加者主要是第三、九战区师长以上将领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一百余人。会议检讨了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我军的作战情况，确定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抗战方略和军事部署，重申我国将继续实施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在局部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牵制和消耗敌人，策应敌后的游击部队，迫敌局促于点线，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在军事部署上，准备轮流以三分之一兵力用于正面战场的防御，三分之一兵力进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三分之一兵力调后方整训补充，强化战力，准备将来的总反攻。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决定整顿军队，重新划分战区，简化指挥层次，以提高部队的战力和机动性。据此，全国战场划分为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战区和苏鲁战区、冀察战区、并设桂林及天水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之各战区。同时，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建制，

以军为战略单位，使最高军事统帅部至战略单位，只有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四级，而新编制之师，也废去旅一级建制，由此使我正面战场之正规军队无论在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上，都较前灵活了。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是我国抗战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确定的我方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应该说是基本适当的，特别是从各战区抽出部队轮流整训一举，尤为必要。因为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历经平津、淞沪、忻口、徐州、武汉诸会战，我正面战场野战军主力多已残破，亟待喘息、整理、补充和训练，以恢复和提高战力，否则是很难承担起持久抗战的军事责任的。事实上，由于我们抓住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机，着力整训军队，确定使一批批部队迅速恢复了元气，并在后来的战争中取得出色战绩（如经过近一年整训的第5军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桂南会战中攻坚作战，全歼日军一个旅团）。此外，由于对军队的指挥系统重新进行了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抗战初期以来正面战场我军指挥混乱，层次繁杂，以及命令转达迟滞、部队运动不灵的弱点。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我重新回到设在益阳的第31集团军司令部，不久，被任命为第98军军长。

但这并不是一件令我愉快的事情。这支部队原是湖北地方军队，战力很弱，内部成分亦复杂，官兵均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对我们这些“外来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出身黄埔的将领，似乎怀有很大的戒心，使我颇难打开局面。上任伊始，我处事十分谨慎，力求一点一点地改造这支军队。



然而我履任新职不足一月，一项新的任命将我调离了该军。

1938年12月中下旬，我突然接到我的老朋友、时任新编第11军副军长的杜聿明将军的一封电报，大意是说该军刚刚由第200师扩编而成，亟需人才，现其荣誉第1师师长一职尚空缺，问我是否有意“屈就”。

接到这封电报，我考虑了整整一夜，最后决定辞去第98军军长一职，接受杜将军的邀请。我的想法是，在汤恩伯将军这里，虽然位居军长，但以该军现状，恐很难有所作为。再者，汤氏本人虽然一向待我算是不错，但我对他是有看法的。他这个人指挥作战缺乏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非大将之材，且其专好重用亲信，大权独揽，使人不宜在其底下放手做事。而新编第11军是我国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该军前身为陆军装甲兵团，1938年初扩编为第200师，年底再扩编为军），装备精良，战力甚强，在这样的部队中带兵打仗，不难有一番作为。况且军长徐庭瑤将军和实际主持军务的副军长杜聿明将军，一位是我多年的老长官，一位是我的亲密朋友，彼此相知很深，在一起推诚共事是没有问题的。两相比较，我毅然选择了后者。

杜聿明将军接到我的复电大喜，即向军政部申报，很快得到何应钦部长的批准。汤恩伯将军知道我要调走，有些不解，似有挽留之意，特地召我谈话，一再问：“你真的决定要走吗？”见我的态度十分坚决，遂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当晚，他留我在司令部吃了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我饯行了。

我于1939年元旦前后就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

长。去后不久，军长徐庭瑤将军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将军继升军长，我乃调升为副军长，仍兼荣1师师长。这时，军的番号也改为第5军。

第5军共辖三个师。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黄埔三期毕业生）；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此外，还有军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重炮团、辎重兵团等部队，全军约五万余人。第200师与军部驻于广西全州地区，新编第22师驻于湖南东安地区，荣誉第1师驻在湖南零陵地区。

我到第五军时，部队正在后方抓紧训练。徐、杜二将军都善治军。特别是杜氏继任军长后，进一步强化军事训练，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要求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具有“五除”（除骄、除惰、除伪、除欲、除恶）、“三习”（习精、习诚、习勤）的朝气，刻苦练兵。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几乎日日夜夜身在部队，严格督促。我初到便感觉到这支军队确有一番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队的新气象，令人鼓舞、振奋。

荣誉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拨编而成的，官兵抗日意志坚决，作战经验丰富，勇敢善战，是一支素质不错的队伍。但由于部队老兵多，统驭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是团营级军官中，湖南籍军官同广东籍军官之间也有些矛盾，经过鄂东战役后，这支部队残破不堪，亟待整顿。

我到职后，承军长信任，即悉心策划，锐意整顿，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支部队训练成为一支抗日劲旅。我

首先抓部队的爱国思想教育，努力增强官兵对日寇的民族仇恨和抗敌意识，同时大力整顿军风，严肃纲纪。当时本师第2团有位陈姓团长，平素行为不甚检点，还在军中吸食鸦片，虽然多次劝诫而不能改正，我乃设法将其调出。对于其他不守纪律、违犯军规的官兵，我均按规定视其错误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而对于表现出色的军官和士兵，则及时予以奖励。如第3团团长郑庭笈，不仅勇猛善战，治军有方，而且个人操守优良，我对其信任有加，多方倚重。初时有人尚不服，私下说该团长与我同姓“郑”，可能有亲属关系，故有意抬举他。其实郑氏是海南文昌人，我是湖南石门人，彼此家乡相距千里，原来根本不曾相识，更无丝毫“裙带”关系。以后郑团长果不负厚望，在桂南昆仑关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颇受杜军长赏识，乃将其调至第200师升任步兵指挥官。

总之，经过一个时期的悉心整顿，部队的精神面貌的确有了很大转变。在军事训练方面，我在副师长兼参谋长舒适存的协助下，大胆革除旧的形式主义那一套，侧重实战训练，严格要求每一位官兵都切实掌握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项军事技术。考虑到近代战争已发展为多兵种的联合作战，我还格外注意加强部队的步炮（包括战车）协同作战能力。这样从严训练仅半年时光，荣誉师士气旺盛，战力大大提高。

这期间，为了充实部队各级领导力量（我到职前后，师部和团营有不少空缺），我曾延请原在第2师的一些旧属前来共事。不久，舒适存、吴啸亚、汪波、赵霞等先后应邀

而来。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舒适存因其才干超群，亦为关麟征将军所器重，曾有意擢升他为军参谋长，而舒氏因与我有约在先，遂坚辞不受，如期而来。他来时，关将军还特地修书送行，其中有“兄之去，有古义士风，钦敬之余，尤使弟爱才难舍”等语。

从1938年冬至1939年秋，第5军各师进行了近一年的严格整顿和训练，全军的军事素质达到很高水平，精神风貌亦为之一新。其间最高统帅部曾派员到全州校阅，第5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之冠。入秋后，第5军又在广西界首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师攻、防、追、退演习，历时一月之久，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将军、训练总监徐庭瑤将军等亲来参观督导。通过这次大型演习，进一步打下了第5军的作战基础。

## 四 血战昆仑关

自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武汉会战末期，日军三个师团从大亚湾登陆，于1938年10月21日攻陷广州），我国国际补给线粤汉路被切断，华南沿海海岸线亦为敌人所控制，仅广西与法属安南（今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还保持畅通。

日本帝国主义鉴于其“速战速决”的侵华战争战略已无法实现，乃一面在豫、鄂、湘、赣战场对我加强军事压力（1939年先后发动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一面企图截断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实行封锁政策，迫使国民政府因得不到国际援助而屈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39年秋，决定以重兵进攻南宁，切断我西南之桂越公路和滇越铁路，并威慑云南、贵州，动摇我抗战大后方，力求达到以军事手段配合其政治上“逼和”的战略目的。

1939年11月15日晨，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第28师团和台湾守备队（一旅团兵力）共五、六万兵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先后强行在北部湾海面登陆，侵入广西。我军对日军的作战意图虽先已有所察觉，但因对敌登陆地点判断失误，加上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第一线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沿海重镇防城、钦州等相继失陷。随后，日军兵

分三路，直扑南宁。

为了保卫我西南边陲重镇南宁，阻敌北犯，最高军事统帅部命令第5军星夜开赴桂南前线，配合友军向日军反攻。

当时，因湘北战局曾吃紧，第5军已全军调驻衡山以北地区，担任保卫衡山、衡阳的任务。接到这项新的紧急命令后，本军各师迅速由火车输送至广西永福，然后徒步向南宁东北地区集中。第200师奉军部命令，派出步兵两团作为先遣部队，先行由桂林用汽车运往南宁。

然而，日军进展太快，11月24日即攻陷南宁。25日，第200师先头部队600团在南宁城郊二塘附近与敌遭遇，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依恃飞机和炮火优势，向我军发动多次猛攻。第600团官兵在团长邵一之指挥下，沉着应战，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次日拂晓，日军改变战法，派出部队向我军侧后迂回，企图包围并切断我军退路。邵团长严令部队坚守阵地，自己亲率步兵一连，向敌迂回部队反击。激战中，邵团长身中两弹，仍不肯退下战场，指挥部队与敌人肉搏，不幸又中一弹，壮烈殉国。第600团官兵闻团长牺牲，悲愤无比，再度向敌发起有力反击，将日军迂回部队击退，并夺回邵团长遗体，但副团长文模在战斗中负重伤，团附吴其陞牺牲，官兵伤亡达三分之一以上。是夜，该团在第1营营长吴大伟率领下逐步撤至大高峰隘及甘圩附近占领阵地，继续拒敌。这时第200师主力逐次到达，于南宁东北七、八塘间占领阵地，协助友军作战，并掩护军主力集结。该师第598

团在八塘附近与北犯之敌激战一周，予敌重创。12月3日晚，因友军在高峰隘方面作战失利，第200师乃奉命向宾阳以北邹圩附近地区转移。4日，敌第5师团第12旅团进占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我第5军主力荣誉第1师、新22师及军直属部队亦已到达迁江附近地区，奉命在宾阳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此后，敌我围绕着南宁以北高峰隘和昆仑关一线，形成战略对峙局面。

我最高统帅部最初考虑，日军初犯桂南，兵锋正锐，而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六师部队（不包括第5军三个师）经连日激战，损失甚大，乃指示桂林行营迅速调整部署，慎重应敌，不可企求速胜。同时命令桂南我军各部，加紧对敌游击骚扰，破坏道路桥梁及通讯设施，拒阻日军继续深入，以掩护我反攻部队集结。但白崇禧将军等行营高级将领认为，日军侵桂是策划已久的行动，意在截断我西南国际运输线，若坐待敌人从容恢复交通，增调装备精良之援军，不独使我军日后反攻作战十分艰难，也使今后抗战时局更加险峻。不如趁日军目前在桂南兵力分散，南宁附近仅有四个联队兵力，除少数山炮外，其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威力，给养补充亦困难之机，迅速反攻。况我机械化之第5军业已抵达迁江集结，无论兵力、装备都较敌优势，倘能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一举收复南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瑤将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也持相同看法，先后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反攻建议。

12月6日，最高统帅部复电桂林行营，同意并指示桂南我军迅速反攻南宁之敌。桂林行营据此拟定了反攻作战

计划，其大致部署是：将桂南我军划分为东、西、北三路军。由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瑤将军担任北路军总指挥，指挥第5军，作为主力作战部队，迎击沿邕宾路进犯之日军，重点攻击昆仑关，然后在东、西路友军配合下收复南宁。考虑到日军已控制昆仑关、高峰隘等险要阵地，增加了北路军反攻作战的困难，桂林行营决定将刚刚增援上来的第99军92师也使用在这一方面；由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将军担任东路军总指挥，指挥第46军（欠一师）及部分地方武装，在敌后游击骚扰，并破坏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交通；由第3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将军担任西路军总指挥，其第1纵队（第170师、135师）负责攻击高峰隘，吸引日军主力，其第2纵队（第131师、188师）担负破坏敌后交通任务，并切断邕宾公路，阻止南宁日军增援，孤立昆仑关之敌。

根据行营下达的作战计划，第5军积极进行攻击准备。当时邹圩以南迄昆仑关间之道路桥梁及通讯设备已破坏大半，现在忽然又接到反攻命令，各师只好组织部队和民伕星夜抢修。

12月10日，杜聿明军长在迁江附近之谭蓬村召开由全军团以上部队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军事部署和战斗动员。由于敌机时常出没骚扰，会场设在一个山洞里，周围树木茂密，非常掩蔽，容易防空。会场里用横布挂着一张桂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图上用红蓝纸标志着敌我态势。各级官佐都预感到将要打上一场残酷的硬仗，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那天的会议主要由杜



军长讲话，他详细介绍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敌我态势、敌人的兵力和作战特点，以及友军的位置和本军作战部署、任务、作战时间等等。杜将军很有信心地一再鼓励大家说：这次战役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第5军是抗日战争中新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全军将士必须勇猛作战，歼灭日寇，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最后，全体与会军官起立，庄严举手宣誓，务必要胜利完成这次攻坚作战任务。会议一直开到黄昏，各部队长散会后立即返回所在部队传达动员。第5军自组建以来，已整训年余，部队兵强马壮，士气旺盛。作战命令下达后，全军将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与日本鬼子一决雌雄。

12月12日，各师均按指定路线，利用夜行军秘密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随后以突然动作，一举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的第12旅团包围于昆仑关地区，抗战以来罕见的一场惨烈的血战，便在这里爆发了！

从广西邕宁七、八圩之间的山心坳，到宾阳县思陇圩的古漏关，长数十华里，中间可通的仅有一条崎岖曲折的羊肠鸟道。唐宋以来这里就是沟通桂南、桂北的交通孔道，其中南宁至宾阳一段就是所谓“昆仑古道”。昆仑关位于邕宾公路要冲，距南宁以北约八十华里。周围群山叠嶂，绵亘相依，其中多是悬崖深谷，地势极为险要，素有“险峻雄关”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名将狄青，曾于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上元之夜，率军出奇制胜，袭占昆仑关天险，一举平定广南，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昆仑关大战。此次我军攻打昆仑关，对手是装备精良，久

经战阵的凶顽之敌，其困难和艰险又远非当年昆仑关之战所能比拟。

日军侵占昆仑关后，即在关口周围的高地上星罗棋布地修筑起许多据点式堡垒工事，外围设有数道铁丝网和鹿砦等障碍物，并以各种轻重武器编成严密火网，构成拱卫昆仑关的坚固防线。日军发觉被我军包围后，企图凭借昆仑关天险，固守待援。这股气焰嚣张的敌人，以为我军无论如何也攻不下这样险要的阵地，绝未料到覆灭的命运已距他们不远了。

我军的攻击部署是：荣誉第1师、第200师为正面主攻部队，以公路为界，公路线上属第200师。军重炮团、战车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作战；新编第22师为军右翼迂回支队，由原地出发，超越昆仑关，选小路进占五塘、六塘，切断南宁至昆仑关之间公路、桥梁交通要道，堵击敌增援部队北上；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指挥两个补充团编为军左翼迂回支队，由原地出发，经过岭圩、甘棠、长安圩，向八塘大迂回，进占七塘、八塘，策应正面主攻部队对昆仑关的攻击。另外，军汽车兵团、辎重兵团归兵站指挥，担任后方粮弹补给及伤员输送任务。军指挥所设在正面主攻部队第200师和荣誉师分界线的公路边一座高山上的山洞里。

12月18日凌晨一时，杜军长下达了攻击令。我军重炮团和各师山炮营集中火力向日军疾风般轰击，揭开了昆仑关大战的序幕。霎时，敌昆仑关及周围各主要阵地上火光四溅，浓烟弥漫。日军也猛烈回击，双方进行炮战。大约

四十分钟后，日军炮火在我远射程重炮火力压制下逐渐稀疏下来，第一线攻击部队即在战车和我轻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下，向敌人阵地运动。荣誉师的突击队，纷纷跃出工事，猛虎般地扑向昆仑关周围各重要高地。

战斗最初十分顺利，荣誉师各团很快就占领了昆仑关外围的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四四一、六零零等重要制高点。十一时左右，我师又相继攻占了罗塘和同兴西北高地，十三时再克高田圩、石寨隘、同平、桔桃岭，第200师方面攻击也有进展。日军在我军全线猛攻下，一部退守昆仑关核心阵地，一部向九塘溃退。根据缴获的敌人文件表明，本师当面之敌是日军第12旅团42联队。

在正面主攻部队与敌激战的同时，我右翼迂回支队新22师也按原定计划占领了五塘、六塘，与敌增援部队展开激战。

中午过后，我和参谋长舒适存率几位参谋和卫士离开师部，亲往昆仑关以北的第2团阵地视察、督战。此时该团已接连夺取了日军几处高地，正在攻打昆仑关北侧的几个小山头，越过这几个小山头，便是昆仑关关口。汪波团长见我们到了，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战况，立即将团指挥所前移，在火线上指挥作战。从望远镜中看到，我军官兵个个赛过猛虎，一路猛打猛冲，奋勇异常。约十四时许，我军又攻取了一两个小山头，日军防线发生动摇。我估计部队很快可以打进昆仑关，遂带着随行人员下山，跟在第2团后面向前移动。但刚行至山下一小块开阔地，东南方向忽然飞来几架日军水上飞机，在我军阵地上空往复轰炸扫射。

因敌机飞得很低，很快就发现了我们，立即俯冲扫射。我们一时不及躲蔽，只好分散卧倒在附近水田的田埂边。敌机盘旋扫射了一阵子，方扬长而去。我们爬起来一看，除每人溅了一身一脸的泥土，竟无一伤亡。舒适存哈哈笑道：“难怪人家都说师长是位福将，果然刀枪不入，我们也跟着叨光了。”众人闻言也大笑不止，仿佛刚才的危险不过是场儿戏。

空袭刚过，日军增援部队在战车、装甲车配合下由九塘向我猛烈反攻。扼守昆仑关的敌人也乘机反扑，复将第2团刚刚占领的小山头夺去，该团被迫收缩阵地，与敌对峙。我亦将师部移至仙女山，指挥各团作战。

我第一线部队与敌激战至晚，伤亡颇重，仅荣誉师就伤亡官兵百余名，损失战车三辆。入夜，罗塘及同兴北面高地又陷敌手。

当夜，我和师部人员就宿营在仙女山。在山顶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四四一高地和附近几处高地彻夜鏖战，敌我争夺极为激烈。天明时，师部一作战参谋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因阳光反射，为敌发觉，立即有一排排炮弹呼啸而至。幸亏山顶上有巨石相合，成天然障碍，我们隐蔽其间，倒安然无恙。有几位送饭的伙伕，当时也在山上观战看热闹，遭炮击时因无经验，到处乱躲。其中一位急切间只把脑袋插到石缝里，整个身体却都暴露在外边。炮击过后，他还不肯出来，犹在那里撅着屁股瑟瑟发抖，引得众人一阵阵大笑。

19日，杜军长命令荣誉师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重点

指向六五三高地。这个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点，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有二百余名日军据险死守。从拂晓起，本师左翼第3团组织多次冲锋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日军乘我军攻击顿挫发动逆袭，双方激战甚烈。在此关键时刻，我军连长杨朝宣、排长杨明率突击队，携带刺刀、手榴弹冒死突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将敌大部歼灭，终于控制了这个重要制高点。日军恼羞成怒，在飞机掩护下不断向六五三高地发动逆袭，并对我老毛岭及四四一高地守军猛烈反击，激战整日，但均被我军击退，损失惨重。日军为了挽回败局，于当日由南宁派出援军分乘四十辆军车，强行通过我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股敌人的意外到来，加剧了我军的作战困难。

鉴于敌人正面的顽抗，以及敌人后方部队不断强行增援，杜军长决心增强第一线攻击兵力，命第200师接替两日来伤亡较大的荣誉师防守仙女山、六五三高地、老毛岭、枯桃岭等阵地，并担任正面攻击，荣誉师则负责向昆仑关之敌两翼迂回包围，以求迅速击破日军。

12月20日清晨，第200师部队在一连战车和重炮支援下，猛攻昆仑关。为了配合第200师作战，我命荣誉师主力第1、2团由老毛岭、四四一高地，第3团由石塞隘、同平夹击八、九塘及其北方公路两侧的敌人，战况颇顺利。七时许，我战车一度突入昆仑关，步兵也从东、西、北三面逼进守关之敌，但日军顽抗不退，在空军配合下拼命反扑，终使我军立足不稳，不得不退出昆仑关。此后我军一连强攻两日，均未能拿下关口，且有较大伤亡。

由于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我军随时都有可能因敌人得到南宁方面的增援而前功尽弃，杜军长为此极为焦虑。12月22日深夜，他同我详细分析了几天来的战斗情况，感到战事之所以未达到预期进度，除了日军训练有素，惯于山地作战，我军对此估计不足外，我军也暴露出一些严重弱点，如正面部队攻击面过宽，使兵力不易集中；步炮及战车协同不良，火力分散，虽弹药消耗多而效果甚少。此外我军未拔除日军在昆仑关两侧各高地上的坚固据点，而径先攻击关口，使自己在四周敌人的交叉火网下难以立足，这在战术上也是失策的。为此，经与各师师长磋商，杜军长决定立即调整部署，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采用要塞攻击法，集中优势兵力夺取昆仑关周围的几个重要高地，重点指向昆仑关西北的罗塘高地，最后再解决昆仑关之敌。

考虑到荣誉师官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近几日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杜军长把攻打罗塘高地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同时命我抽出第3团，利用夜行军从右翼高地袭击九塘日军阵地，对昆仑关之敌作战术包围。第200师各团则由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兵力。

罗塘高地是昆仑关西北的天然屏障，也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日军在阵地上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工事，并在前沿设置了三道铁丝网，其第21联队的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余人，配备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数门，防守在这里。此外，罗塘守敌还得到附近同兴小高地、搞头以东高地日军的火力支援。

12月23日，我命第1团吴啸亚部首先投入攻击。为躲

避敌机轰炸，攻击时间定在傍晚。但该团整整攻打了一半夜，也未取得什么进展。杜军长很焦急，不时在电话中催问战果，最高统帅部也直接向我了解战况。我深感此战责任重大，乃决心尽最大努力攻克这一要点。

次日中午，我命第1团接替第2团在四四一高地的防务，改由第2团汪波部担任主攻。为了指挥方便，我偕参谋长舒适存将指挥所又迁回距罗塘高地最近的仙女山，亲自布置对罗塘之敌作最后的总攻。

经连日鏖战，第2团损失很大，兵力仅余不足两营，但官兵们都打红了眼，士气极为高昂。我命汪团长挑选一营官兵组成突击队，于午后三时许隐蔽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另配属德造十五生重榴弹炮一连、迫击炮一营、重机关枪两连作强大火力支援。

临近黄昏，折腾了一天的敌机终于退去，我即命炮兵集中猛轰罗塘高地，摧毁日军工事。一小时后，令炮兵延伸射击，并以少量步兵佯攻，将敌人诱入阵地，再以强大炮火猛袭。这阵炮火打得又准又狠，轰得日军在阵地上狼奔豕突，死伤近半。一刻钟后，我军炮火再度延伸射击，匍匐在山下的突击营官兵一跃而起，以排为单位梯次配置，前仆后继，飓风般地突入敌阵。在攻击中，我军排长喻国强中弹负伤，卧在血泊中坚持指挥战斗，后见另一名排长陆谨卿率队前来增援，勇气益增，夺持大刀一柄，振臂大呼：“弟兄们，杀呀！”与陆排长并肩率先冲锋，奋力劈开敌阵地前沿的铁丝网，后继官兵一拥而上，突入敌阵，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我军另一连指导员李高荫在其连排长相继负

伤后，自动督率全连官兵向敌突击，最后壮烈殉国。至晚七时，扼守在这一高地的日军除两人负伤被俘（其中一名因伤重于翌日死去），其余全被击毙，我军战旗终于再度插上罗塘高地。但此时我第2团突击营，也只剩下数十人。

攻克罗塘高地，大大振奋了全军的战斗士气，杜军长格外高兴，下令嘉奖第2团全体官兵，并犒赏法币五千元。蒋介石先生也亲由重庆来电褒勉：

桂林郑师长洞国：敬亥参二电悉。○密。昆仑关之得失，影响于南宁作战者极巨。该师激战七昼夜，卒克要点，具见该师长指导有方，将士用命，深用嘉奖。仍希本一贯之精神，以殄顽敌，完成任务为盼。川。中○。艳中。令一元驥。印。

我立即将嘉奖电及嘉奖令晓示各团，鼓励全师官兵再接再厉，英勇奋战，直至全歼昆仑关之敌。

在我师汪团攻打罗塘高地的同时，第3团在九塘附近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24日下午四时许，第3团运动至九塘两侧高地时，正遇敌第21联队主力强行向昆仑关增援。该团郑庭笈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九塘敌阵地，发现九塘公路边的大草坪上有日军军官集合讲话，遂命第1营在高地上占领阵地，命令迫击炮连、重机关枪连集中火力向敌猛击。敌人未料到我军已悄悄摸到附近，猝不及防，被我毙伤甚众。战后查明，日军第12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就在这次炮火袭击中被我军击毙。

我军正面两师乘攻克罗塘高地之余威，于12月25日继续向界首附近及六五三高地西南侧等日军据点发动猛



攻，战斗极为激烈。黄昏前，同兴附近有一股日军企图突围，被我军击溃，遗尸遍野，残部狼狈向南溃逃，我军俘获战马三十余匹及文件、武器甚多。昆仑关以西地区，除同兴附近尚有一小股日军顽抗外，其余均为我军控制，荣誉师第3团且已攻略昆仑关部分阵地，并占领其附近各高地，残敌纷纷退守昆仑关东侧高地。

日军这时已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仅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其弹药给养尤为困难，几陷于绝境，包围圈内的日本鬼子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后，便生吞附近田间的稻谷，最后不得不摘拾树叶、草根。一些敌兵因弹药用尽，只好用竹子削成梭标来与我军作战。不少横卧在山野上的被我军击毙的日军尸体，看上去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着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从中可见其处境之窘迫。日军曾出动飞机空投物资，救援被困部队，但不断遭到我军炮火拦截，有些降落伞也被我军缴获了，其中有做工十分精致的饼干、肉食、蔬菜、食盐以及罐头等，我们在前线曾享受过几次日本人“奉送”的大餐。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这支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钢军”的士气开始下降了，我军缴获的日军作战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数日以来，当面之敌对我猛烈攻击，其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经过一星期的血战，我军伤亡虽大，却斗志不减。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正当前线酣战之际，昆仑关附近的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将家中仅存的酒、肉、粮食、蔬菜等统统拿出来劳军。昆仑关地处桂南山区，土地瘠薄，经济凋

敝，老百姓的生活极为贫困。杜军长曾指示各师，务必严明军纪，不准擅动民间一草一木，故对百姓们的盛情，我们再三辞谢。但仍有许多百姓执意要送，而且非要亲自送到火线上去。在罗塘高地激战时，就有一些青壮村民肩挑手抬，准备冒着敌人的炮火将酒肉饭菜送到第一线官兵手中。我出于安全考虑，只好派人收下这些物品，但坚决劝阻他们上火线。面对这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使前线官兵深受感动。

昆仑关战役后期及战役结束后，后方各界民众也纷纷组织慰问团慰劳前线将士，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来到我的师指挥所详细了解战况，深为前线抗日将士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概所感奋，并写下了一首气势雄浑的七言诗：

### 昆 仑 关

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亭空。  
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  
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阵云浓。  
冀云南向输形胜，枢相当年立战功。

从那以后，田汉先生成了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

前线父老乡亲的大力支援和后方各界的热情鼓励，给全军将士增添了无穷的斗志。我正面两师根据杜军长的命令，继续猛攻昆仑关东北及界首附近各高地之日军阵地，力

图将残敌一举围歼。新 22 师和彭璧生支队，连日来也在六塘、八塘附近与日军激战，予敌增援部队沉重打击。

正当我军步步紧逼、胜利在即之际，却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12 月 25 日，由南宁向昆仑关增援的日军台湾守备队之第二联队主力，迂回攻击我左翼第 99 军 92 师防守的高山岭、桔子岭一线阵地。午后，该线阵地为日军突破。第 92 师在新 22 师一个团的配合下，虽于次日重新恢复了原阵地，但前后仍有两千余日军突入，对我攻关部队威胁甚大。

昆仑关残敌得到这支生力军的增援后，死灰复燃，遂凶猛反扑。12 月 27 日，敌援军千余，在空军和地面炮火支援下，向四四一高地猛烈反攻，我守军与敌激战良久，伤亡殆尽，此处位于昆仑关西南的制高点不幸又陷敌手。同时，另有大队日军（约一联队兵力）不顾我新 22 师及友军第 92 师等部的阻击，不断强行由六、七塘间渗入。昆仑关战局再度出现反复。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杜军长经向桂林行营和集团军总部请示后，决心进一步收缩兵力，加强正面攻击力量，逐次攻略昆仑关附近各要点。为此，军部将在六塘、八塘附近作战的新 22 师主力和彭璧生支队陆续调回，担任军总预备队；命新增援上来的友军第 159 师主力接替第 200 师在六五二高地、六零零高地、枯桃岭、立别岭一线的防务，该师另一部接替彭璧生支队之原阵地；命第 200 师（配属军补充第 1 团、山炮一连、战车一连、新 22 师迫击炮连）展开于罗塘南端高地、同兴北侧亘界首北侧之线，以重点保

持于公路东侧，逐次攻略昆仑关东北侧敌各据点，并向九塘附近进攻；荣誉师占领仙女山及其以南金龙山高地亘老毛岭之线，策应第200师攻击。杜军长考虑，四四一高地为我军右翼前进之重要支撑点，东可控制昆仑关及至五塘公路，若久为日军占领，则成为我军攻击的一大障碍。乃指示我师抽出有力部队，务必夺回该高地并固守之。我将反攻四四一高地的任务，交给了第1团团长吴啸亚。

12月29日，第200师在优势炮火的支援下，向界首东西各要点发动强攻，战斗极为激烈。与此同时，荣誉师第1团吴啸亚部也于拂晓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向四四一高地猛烈攻击。该团官兵冒着日军炽烈的火网，不顾重大牺牲，经几小时剧烈战斗，奋勇杀上主峰，将残敌驱逐至高地南侧，敌我各据反斜面阵地，相距仅百余公尺。未几，敌援兵二三百人赶至，复向我凶猛反扑，双方在主峰两侧肉搏厮杀，血战彻夜，我军阵地始终屹然未动。

这天下午，我正在师指挥所指挥部队攻击四四一高地之敌，忽接杜军长电话。他极为焦虑地告诉我，第200师对界首高地的攻坚接连受挫，损失惨重，已无力再施攻击，问我有何办法。我心里清楚：界首，这个位于昆仑关东北的险要高地，山势巍峨陡峭，其东西侧可居高临下俯瞰昆仑关，军事价值极重要。我军若不能有效控制这一要点，就无法夺取昆仑关并在那里站住脚，故杜军长急切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考虑片刻后，我觉得荣誉师老兵居多，打攻坚战有些经验和把握，虽然部队经连日剧战伤亡甚重，且正与敌人在四四一高地浴血厮杀中。但界首高地之得失如

此重要，在此战役关键时刻，不能不做最后拼搏。遂毅然向杜军长表示，本师第3团郑庭笈部刚刚归回建制，尚有相当力量，可调去攻打界首高地。军长见我在紧要关头能以大局为重，不由大喜，大声称好，命将该团即刻调归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指挥，马上准备投入攻击。

与杜军长通完话，我还不放心，特命郑庭笈团长速到师部来，当面向他交代一番。不多久，郑团长披着满身征尘，急促促地跑到我跟前。我扼要地向他布置了作战任务，并提示了一些山地攻坚战的要领，最后加重语气，格外严肃地说：“郑团长，能否迅速夺取界首高地，事关战役全局。军长命令你部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它，倘作战不力，定将以军法论处！”

“请师长绝对放心，我一定拿下这个高地。若攻不下来，不用军长杀我的头，我自己杀头！”郑团长一路跑得气喘吁吁，但口气极为坚定。他庄重地向我行了军礼，转身又大步奔回自己的部队。

当日黄昏，敌机久久不肯退去。第3团官兵冒着敌机的扫射和高地上日军倾泻的浓密火网，高声呐喊，勇猛冲锋，但多次被敌人击退。以后郑团长又组织爆破手，以集束手榴弹炸敌人的地堡，但几批爆破手在日军的侧射火力下无法接近，先后中弹倒下，攻势一再顿挫。此时该团已遭受很大伤亡，九个步兵连中，就有七个连长伤亡。郑团长不愧有勇有谋，见强攻不成，遂改为智取。当夜，他挑选了一支敢死队，利用夜色掩护，分组悄悄地爬上山去，在敌人阵地前沿附近潜伏起来。次日拂晓，我军调整后的重

炮再度向界首高地猛烈轰击，把敌人的工事打得七零八落。炮击刚停，早已埋伏多时的各突击组便迅猛地跃入日军阵地，用手榴弹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日军见我军犹如神兵天降，眨眼功夫就出现在眼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由慌乱起来，只好纷纷端着刺刀，嚎叫着跳出工事与我军拚命。郑团长在山下见敌人方寸已乱，即不失时机地挥兵掩杀，经三小时激战将守敌全歼，终于攻占了这一险要的制高点。

界首一失，昆仑关之敌顿失屏障。军部命令新 22 师超越第 200 师阵地，围攻昆仑关。12 月 31 日午前十一时许，该师邓军林团将昆仑关完全克复，残敌纷纷向九塘溃退。

郑庭笈团在界首高地传出捷报时，荣誉师正面仍在四四一高地与日军苦战，战况空前惨烈。12 月 30 日晨，日军陆空协同反攻，我第 1 团余部坚守四四一高地主峰及附近几个山头不退，屡挫敌锋。激战中，第 1 连连长张咸顺、第 3 连连长刘世昌、第 6 连连长溶开等先后壮烈牺牲，第 5 连连长王延安也被日军重机枪枪弹洞穿双腿，身负重伤，各连士兵伤亡更重，每连仅存一二十人。上午九时许，日军乘我伤亡惨重、兵力疲乏，倾其全力再度向高地东侧猛攻，据守此处的我军官兵伤亡殆尽，丢失了两个山头。次日晨，我调补 3 营增援上去，该营动作迅猛，几次冲锋将失守之两个山头夺回，毙敌百余。

此时我军已攻占昆仑关，日军虽被迫向九塘方向溃退，却丝毫未放弃控制四四一高地的企图。盖因该高地为昆仑关西南之有力支撑点，敌人为了争取时间，及作尔后进退攻防的打算，都欲与我拚死争夺，必求得之。1940 年 1 月 1

日，日军不惜孤注一掷，调集重兵，在飞机掩护下，由石桥、上寥、那林三面围攻我主峰阵地。第1团及补3营官兵头顶敌机的狂轰滥炸，英勇抗击近千名日军的持续进攻，最后终因伤亡殆尽，被迫退至高地北侧一隅死守待援。

鉴于四四一高地危急，我只好将手中唯一掌握的机动部队——第2团余部派上去与敌人做最后的争夺。该团这时仅存三百余官兵，临时编为三连，由汪团长指挥增援反攻，苦战终宵，敌我伤亡均极惨重，然日军援军仍在增加，我守军不足两百人死守高地北侧，与敌距离仅隔棱线，对峙成胶着状态，高地西侧山头，亦悉为敌人占领。

双方相持至元月二日，敌机协同步炮兵继续猛攻，第2团官兵伤亡更巨，但仍死死守住了阵地。次日黄昏，残暴的日军竟狗急跳墙，惨无人道地向我军施放毒气，随后再以陆空协同进攻，守军愈战愈少，阵地危在旦夕。这时，连惯打硬仗的汪团长也沉不住气了，连连在电话中向我告急，最后甚至哀声请求：“师长，我实在顶不住了，弟兄们快拚光了，您就让我先撤下去吧！”

参谋长舒适存在旁听到，急切地说：“师长，汪团不能撤，我们必须与敌人打到底！”他生怕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深知汪团长的处境，事情非到万不得已，这条铮铮硬汉是绝不会想到在敌人面前撤退的。但又虑及四四一高地万一失守，不独使本师数日来之血战功亏一篑，也将使整个战役受到严重影响，遂咬紧牙关，斩钉截铁地说：“汪团长，现在敌我已决战至最后关头，坚持到底便是胜利，你

一定要死死顶住敌人，等待增援，没有命令不准放弃阵地！”

我见他还在犹豫，乃厉声命令道：“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你也要给我顶住，丢了阵地，我砍你的头！”

军令如山，汪波从我不容置否的严厉态度中，知道我绝不会允许他撤下高地，只得督队拚命死守。

这时，舒参谋长已将师部特务连一部和传令兵、伙伕等勤杂人员及部分主动请战的轻伤员等共一百八十余人，组织成一支突击队，整队待命。这是我们身边最后的一点力量，成败在此一举。我下定决心，命突击队立即出发，跑步增援四四一高地。

突击队利用暮色掩护，悄悄绕至敌阵地侧背，突然发起猛攻，四四一高地四周一时枪声大作，杀声震耳。日军久战不下，已成强弩之末，更未料到已是精疲力竭、伤亡惨重的我军，此刻还能发起这样凶猛的进攻，顿显慌乱，在我军猝然夹击下，死伤枕藉，残部仓皇退去，我军遂将昆仑关周围的这最后一处重要高地稳固占领了。

昆仑关战役，是中日两国精锐军队间的一次殊死决战，其激烈程度为抗战以来所罕见。而在这次战役中，四四一高地争夺战又是往复拉锯最剧烈、持续时间最久、彼此牺牲最惨重的一次战斗。战斗结束不久，我偕参谋长舒适存踏着尚未消尽的硝烟，亲往该高地视察。双目所及，但见主峰及附近各山头上弹坑累累，子弹壳、炮弹壳、手榴弹木柄、破损的枪械比比皆是，草地树木悉被焚烧，无一块完好之地，双方许多阵亡官兵的尸体散卧其间。高地北侧，是我军最后据守的阵地，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棱线



两侧敌我死伤枕藉，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倒卧在血泊中，几无法插足。沿着高地北侧前行，仅几十公尺距离内我军阵亡将士的遗体就有近百具，据江团长介绍，这些烈士是在向敌人反冲击时先后倒下的。有不少烈士虽早已停止了呼吸，但还怒目圆睁，身躯保持着向敌冲杀、投弹的姿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个子士兵，他的左腿已经断了，身上几处弹伤刀痕，军衣浸满紫褐色的血迹，但一双粗壮的大手却死死钳住一个日军士兵的喉咙，将其压在身下。显然，这位烈士是负伤之后，又与敌人肉搏牺牲的。目睹此悲壮情景，连我这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也不禁落下热泪。的确可以这样说，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完全是靠抗日将士们的血肉和生命换取的。

荣誉师攻占四四一高地后，因伤亡奇重，奉命转移至思陵以南地区休整，防务由第200师接替。这时，九塘及其北方公路交通，均在我军控制之下。元月4日拂晓，新22师和第200师乘胜攻击，与南宁增援之敌激战于九塘，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亲冒矢石，指挥作战，不幸负伤，但我军终于攻占九塘。此后两师又一连攻击数日，终因兵力薄弱无大进展，遂于元月10日奉命将防务移交第36军接替，撤至思陵附近整补，昆仑关战役乃告结束。

是役，我军将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12旅团基本全歼，并歼灭其台湾守备队一部，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第42联队长坂田元一、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第1大队长杵平作、第2大队长宫本得、第3大队长森本宫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军官，均被击毙，士兵亦有

四千余人阵亡（这是战后日本防卫厅公布的数字）。我军俘获日兵 102 名，战马 79 匹，缴获山炮 10 门，野炮 12 门，战防炮 10 门，重机枪 80 挺，轻机枪 102 挺，步枪二千余支（各师未上缴的数目尚未在内）。其他军用品和弹药等堆积如山，不计其数，造成抗战以来我军攻坚战役的首次胜利。

战役结束后，我们将大批战利品运至柳州、桂林、全州等城市巡回展出，大大鼓舞了后方民众的抗战信心。最高统帅部对取得这次战役胜利也格外振奋，下令嘉奖并犒赏第 5 军全体将士，并给杜聿明将军和我，以及戴安澜、邱清泉等有功将士授勋。第 5 军参谋长黄翔赴重庆向军委会汇报战况时，蒙蒋介石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女士亲自召见，设晚宴款待。席间，蒋先生夫妇详细询问第 5 军及友军在昆仑关作战经过，对我军抗日将士奋不顾身、忠勇爱国的精神褒勉有加。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第 5 军就有一万一千余人负伤，五千余人殉国。其中荣誉师伤亡官兵达二千四百余名，可见牺牲之惨重。为了祭奠昆仑关战役中的英烈，杜聿明将军于 1946 年特在昆仑关之阳修建了阵亡将士墓园和纪念塔，并将他当年所写的挽联刻于柱上：“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

纵观昆仑关之战，我军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攻坚作战，血战近二十日而力克昆仑关天险，歼敌一旅团之众，这样出色的战例又为八年抗战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这次战役能够取得胜利，除了杜聿明将军等前线将领指挥坚决、果断，广大将士勇敢用命以外，我上级指挥机关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对战机的准确把握，以及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援等等，也是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此外，部队平时的训练、官兵的军事素质，和实战中步、炮、战车的协同等等，也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不过，我军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如战前准备不充分，对敌人的顽强抵抗估计不足，作战中炮火和兵力的使用不够集中，攻击点的选择有时不够科学等，这些使我们多付出了一些代价。实际上，第5军在歼灭敌第12旅团后，因兵力消耗太大，已无力再承担反攻南宁的任务，只能撤下整补，不久昆仑关又陷敌手。以后桂南我军在粤北第12集团军的呼应下，乘日军被迫收缩战线之机，发动春季攻势，再度收复昆仑关，并于同年10月克复南宁、龙州、钦州等城，终于将日军完全赶出桂南，历时一年的桂南会战方告结束。

## 五 参加枣宜会战及驻防宜都

昆仑关战役结束后，第5军撤至柳州一带整补。这期间，我们在柳州专门召开军事总结会议，认真、深入地探讨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日军的作战特点及战术等。会议材料上报后，颇受最高统帅部重视。

经昆仑关一战，第5军威信大增，深受各方瞩目，被誉为抗日劲旅。杜聿明将军对荣誉第1师在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尤为满意，除奖励有功将士外，还多次与我商议，希望能从汪波和郑庭笈这两位骁勇善战的团长中，选一人到第200师去，他特别欣赏这两个人在训练部队和作战指挥方面的才能。以后郑庭笈奉命到第200师，担任步兵指挥官。

我对杜将军这种奖惩严明、求贤若渴的态度十分钦敬。本来，第200师是杜氏的基础部队，他对这支部队一向倾注了很大心血，却从不因此私心用事，过分偏爱。在昆仑关战役中，荣誉师和第200师都担任过主攻部队，表现均极出色。但杜军长认为荣誉师在部队训练上有一套办法，且因部队老兵多，官兵实战经验丰富，作战勇猛灵活，所以很重视并推广本师在训练、指挥、战术运用及战斗作风方面的经验，藉以提高整个部队的战斗力。他调郑庭笈去第

200 师，用意也在于此。这种待人处事的胸襟和气度，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中确实是很难得的。

不久以后，部队重新进行了改编。我奉命以荣誉师为基础，组建新编第 11 军（后番号改为第 8 军），由我担任军长。军辖三师：荣誉第 1 师，师长舒适存；第 33 师，师长张世希；第 5 师，师长姓刘，是江西人，但名字记不清了。第 33 师当时尚驻防于鄂西，以后也始终未曾回归建制，实际归我指挥的部队只有两师。

离开第 5 军前，杜聿明将军大摆酒宴为我饯行。由于刚刚打了大胜仗，大家情绪高涨，那天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我也被众人灌了许多酒，以至舌头打结，连说话都不利落了。抗战八年，似这般轻松快乐的时光是不多的。

新 11 军刚刚成立，即奉命开赴湖南衡阳。由于荣誉师在昆仑关战役中减员很大，补充了大批新兵，尚未及训练。第 5 师虽是老部队，但战力较弱。所以一到衡阳，我就着手大力整训部队，力图尽快恢复和提高部队战力。

可惜我们在衡阳仅驻扎月余，即逢枣宜会战吃紧，日军主力正向鄂西战略重镇宜昌迫近，我军旋奉命紧急开赴鄂西增援。

先是，武汉会战以后，日军虽然占据了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并先后攻占了南昌、九江、岳州、钟祥、信阳等地区，形成了拱卫武汉的安全圈。但是，中国军队仍据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大洪山、桐柏山及随枣、宜昌、襄樊等据点，不仅成为我川陕后方的重要屏障，也对武汉日军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日军曾于 1939 年 5 月出动

四个师团共十余万兵力，进攻随（县）、枣（阳）地区，企图一举围歼集结在这一区域的我第五战区主力。我军在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下，与敌周旋月余，迫敌无功而返，是为随枣会战。

这次会战结束后，我军于1939年冬在豫南、鄂北主动出击，予敌很大打击，使日军更感觉到武汉受到严重威胁，遂重新调集四个半师团以上的兵力，于1940年5月发动枣宜会战，分三路进攻枣阳、襄阳、宜昌等地。其作战企图是：首先在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围歼我第五战区主力，再转而将汉水右岸的我军压缩至宜昌一带歼灭之。

1940年5月初，各路日军先后发起猛烈进攻，遭到第五战区各部队的奋勇抵抗。双方激战数日后，中国军队主力不计城池得失，冲出日军包围圈，大胆转入外线作战。至5月10日，各路日军虽然会师于唐白河畔，但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的计划却成为泡影，反被转入外线的我军主力包围于襄东平原。在我军的围击堵截下，日军被迫败退，我军一度收复枣阳。为了截击渡襄河向东南败逃之敌，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率直属特务营和所部第74师两团兵力，在襄河东岸南瓜店附近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血战，最后壮烈殉国，所率官兵也大部阵亡。抗战以来，张将军几乎无役不从，屡挫敌锋，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他的牺牲，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

此后，日军虽增调援军，再占枣阳，与我军相持于唐白河一线，却无法再取得新的进展。

5月31日，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围歼襄东平原我第五

战区主力的计划，集中两个师团兵力，强渡汉水，南下进攻宜昌。

为适应局势，方便指挥，最高统帅部决定将长江两岸划为第六战区，由陈诚将军担任战区司令长官。

6月初，我率军部和荣誉师赶至宜都，第5师稍后也进抵枝江待命。这时鄂西形势已相当吃紧，各路日军纷纷逼近宜昌外围，与我军在当阳、枝江一线激战。

我抵达宜都后，因军情紧急，未及休息即渡江到设在长江北岸三游洞的第六战区司令部请示机宜。陈诚将军亲自向我介绍了敌情，命本军编入郭忏将军指挥的江防军序列，担任长江一线防务。

接受了任务，我连夜赶回宜都防地，部署部队沿江布防。这时第5师也奉命开到宜都，我将该师控置于第二线，作为预备队。

次日深夜，忽接战区长官部急电，谓江北战局危殆，命我率荣誉师立即渡江增援，留第5师负责江防。

我刚刚率荣誉师渡过江，又接陈长官电令，要我的军部仍撤回南岸，荣誉师归第26军军长萧之楚将军指挥。但该师尚未与友军联络上，便与大批日军遭遇。时我江北部队正向宜昌方向撤退，荣誉师以孤军与日军奋战一日，方奉命乘黑夜掩护向鸦雀岭转移，改归第2军军长李延年将军指挥。岂料该师于次日晨到达鸦雀岭时，友军已走得不知去向，日军又跟踪而至，只得再向宜昌以东之土门垭转移。

土门垭位于汉宜公路要冲，是宜昌的门户，军事地位

十分重要，可惜我军事先未在此构筑强固阵地，亦未配置有力部队防守。荣誉师在土门垭与日军血战整日，势单力薄，终难立足，处境愈来愈险恶。

当日傍晚，我接到陈长官电令，大意是命荣誉师相机向宜昌西北山地转进，准备尔后之攻势。但命令中有几个字词意模糊，让人无从把握，我阅后颇为踌躇。这时荣誉师连电向我告急，我担心再延误时间，日军主力续进，该师有遭围歼的危险，故来不及再向战区长官部请示即将命令转发了出去。不久，荣誉师力战突围，向宜昌西北方向撤退了。

6月14日，鄂西战略重镇宜昌终于失守。我军稍后虽发动反攻，一度夺回该城，但很快又陷敌手。我军只好放弃收复宜昌的打算，重新调整部署，稳固现有防线。日军也因兵员和物资消耗过大而无力再兴攻势，停止了作战行动，历时两月的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宜昌之失，从根本上说是我军战略失误造成的。本来我军在长江两岸集结有大量兵力，却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具有较强机动性的打击力量，反被分散用来防守宜昌及周围众多据点。由于分散兵力固守宜昌诸点，使我军始终处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无法形成拳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处处显得被动，穷于招架，最后被日军各个击破。

枣宜会战结束后，上峰追查宜昌失守的责任，江防军司令郭忏将军以下军长、师长受处分者多达二十余人，我亦因荣誉师弃守土门垭，被记过一次，这是我在国民党军队二十余年戎马生涯中，唯一受到的一次军纪处分。



荣誉师师长舒适存将军因是直接责任者，不仅被撤了差，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据说上峰念其在昆仑关战役中立有战功，这样处置尚属重罪轻罚。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知情者对此事颇感不平。因为荣誉师是按战区长官部命令行动的，如有错误，主要应由战区司令长官承担，怎能向下推卸责任？岂料堂堂陈长官竟不承认向该师下达过相机撤退的命令。以后我们设法找到电令原稿，证实其中确有模糊之处，陈氏又一口咬定是译电员译得不准确，非其原意。并谓即便命令中有相机撤退等语，亦觉撤退过早云云。总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自知辩解无用，也只好认了倒霉。

不久我悄悄在过去的老长官、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的刘峙将军面前疏通，将舒适存改调服军役。故舒氏在重庆土桥监狱只蹲了三天，即被释放回鄂西，到第8军（这时新11军番号已改为第8军）报到，我复委其为军部高参。国民党军队将领间的勾心斗角，于此可见。

枣宜会战以后，第六战区在宜昌以西、以北地区及长江南岸一带与日军相持。第8军负责防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沿长江南岸一线。这时本军第33师改归他部，另调入第103师。该师师长是何绍周，所部原系贵州部队，历史较久，较能作战。

当时，日军虽据有宜昌，但我军仍在江陵、宜昌、当阳、钟祥、信阳以北之线，对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使日军始终摆脱不掉武汉方面所受到的威胁。最高统帅部和第六战区估计日军不甘于这种局面，短期内还有发动大规模

攻势的可能，乃命令各军加紧整顿，巩固阵地，准备迎击进攻之敌。

遵循上峰指示，本军接防后即全力加强防务。鉴于日军装备精良，火力强大，且拥有制空权，因此坚固的工事依托对于实行阵地防御作战十分重要。为此，我与参谋长潘华国、高参舒适存等悉心筹划，督促各师夜以继日地赶筑工事，仅用不到两月时间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其中以沿江工事最为坚固。因为那一带山地多由巨石构成，我军用炸药在石头上开洞，建成众多的碉堡、掩蔽部，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奈何不了我们。考虑到实战需要，我军还在各段阵地加设了一些侧射、反射火力点，并加强纵深防御，使防务日臻完善。

是年秋，日军果然分多路大举渡江进犯，遭到第六战区各部队迎头痛击。本军防线为日军重点进攻目标之一，故战斗十分激烈，日军的多次凶猛攻势均被击退，并遭受较大伤亡。为扩大战果，我命令各师组织短小精悍的突击队，几乎每夜都偷偷渡过江去袭扰敌人，破坏其通讯设施和补给线，使日军穷于应付。敌我剧战十余日后，日军因伤亡过大，后援不继，被迫撤回江北，我军阵地寸土未失。此后有相当一个时期，敌我除派出小部队互相袭扰外，基本上保持对峙状态，未再发生大规模战斗。

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我转而着手整顿部队，特别抓紧对各级干部的培训工作。军部由舒适存主持，举办了多期干部训练班，每期半月，轮流调训排长至师级军官。训练班除了进行抗日宣传和爱国教育，还从实战出发，进行

各种必要的军事培训，并规定学员结业三个月后，以所授课目为主，举行全军校阅。经一年努力，第8军的精神风貌为之一新，战力大大增强，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屡挫敌锋，成为国民党军队中较为精锐的劲旅之一。

当时军中具体事务，多由潘华国、舒适存等人主持。潘、舒二人有胆有识，作风干练，均为实干人才，对第8军战斗力的提高贡献甚大。

我带兵多年，历来关注军队纪律，在鄂西驻防期间对这方面要求很严格。当时那一带都是偏僻山村，从来没有驻过这么多部队，许多农民见了兵就惊慌害怕，青壮年男子和年轻妇女纷纷躲藏进深山里。我根据当地情况颁布了几条纪律，其中规定任何官兵不得擅自进老百姓的家；不得损坏老百姓的庄稼；不得向老百姓索要物品，买东西必须付钱等等。不久，某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姓尤的班长偷走驻地百姓的一头毛驴，我知道后立命将其枪毙。事情传出后，全军骇然，无人再敢违犯纪律。过了一段时间，老百姓看见部队纪律不坏，官兵待人和气，从不扰民，渐渐消除了恐惧心理，那些躲藏出去的人们也陆续回来了。由于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再加上经常对部队进行爱民教育，广大官兵渐渐养成了遵守纪律、爱护百姓的良好习惯和风尚，军民关系也亲密起来。某次，荣誉师第3团的一个连队清晨出操，一位士兵不慎踩倒两棵苞谷苗，该连连长立刻集合全连训话，并要体罚那名违纪士兵，后来还是那块田的田主赶来求情，才算了事。还有一次，我去荣誉师视察，在师部附近发现一位老汉提着满满一篮子蔬菜，与一个伙伙

模样的士兵争执不休，以为是士兵买了菜不肯付钱，不由大怒，立刻将那名士兵唤来责问。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这位姓杨的炊事班长去买菜，但老乡执意不肯收钱，所以才引起“争执”。于是，我亲自向那位老汉解释部队的纪律，劝他将钱收下了。这些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百姓都称赞第8军的纪律好，部队也以爱护百姓为荣誉。所以本军在鄂西驻防两年有余，与驻地老百姓相处甚为融洽，一时在鄂西一带传为美谈。

1941年9月中旬，日军调集11军四个师团兵力，再次进攻长沙（即第二次长沙会战）。为配合第九战区守卫长沙，最高统帅部命令第六战区积极向荆门、宜昌出击，并相机收复宜昌。据此，陈诚将军决定以第六战区主力围攻宜昌，同时命我率第8军渡江进出于沙洋、后港间，策应战区主力作战。

当时军参谋长潘华国正在恩施开会，因军情紧急，我只好请舒适存临时代理参谋长职务。根据上峰指示，军本应以主力攻击沙市，以一部进出浩子口，向沙洋、后港间攻击。但舒氏认为，战区给本军下达的任务是“相机攻略沙市，主力进击沙洋、后港间，切断汉宜公路，阻止日军增援”。如按上述部署，恐难实现预期效果。他向我建议：以荣誉师相机攻略沙市，掩护军侧背安全，而以主力第5师、第103师进出浩子口以北地区，切断汉宜公路，阻敌增援。这样既可保障军之安全，又可以足够的兵力切断敌之后方交通线，完成战区下达的作战任务。我思考再三，亦觉此议甚妥，遂采纳了他的意见。

大约在9月底，我命荣誉师由荆州（现江陵）东南悄悄渡江，以突然动作攻袭沙市。此举给日军造成很大恐慌，急收缩兵力退进沙市城内固守。我和舒适存趁机亲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临时军部设在浩子口），第103师一举攻占后港，并以一部佯攻沙洋，主力乘虚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毙敌甚众。第5师也在襄河截击敌水上交通，大有斩获。

由于本军的果敢行动，不仅歼灭了大批日军，还使日军的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几日，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可惜由于第九战区作战失利，使日军迅速撤出长沙，向后方回援，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计划功败垂成。10月11日，日军回援部队逼近宜昌，我攻城部队被迫撤出战斗，解围而去。这时本军在江北停留已无意义，遂奉命将敌沿江工事破坏后，主动返回南岸。

第六战区此次反攻宜昌，虽未达到预期目标，却重创了日军，并给敌人很大震动。战后总结，陈诚将军对第8军的战绩和表现十分赞赏，特予嘉奖，并撤销了原来对我的军纪处分。

我军撤回江南后，部队重新调整。战区长官部将第5师调出，另以第82师（师长吴剑平）拨归本军建制。该师也是贵州部队，不过内部成份复杂，尤其是干部间不团结，各方面素质较差。某次该师几位团长竟聚众包围师部，夺持了师长的手枪及座骑，几乎酿成兵变。幸亏舒适存就近及时赶去，才将事件平息。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认真整顿和培训，才逐步扭转了这支部队的一些不良习气，将其改造成一支勇敢善战、作风优良的队伍。

1942年夏，战区长官部考虑到第8军长期驻防前线，部队十分疲惫，特命撤往后方休整。孰料部队刚行至湘西石门、临澧一带，即悉日军乘我军换防，大举渡江进袭，我守军立足不稳，阵地竟被突破，导致宜都一线防务发生动摇。陈诚将军急电命我火速率军回援。

接到命令后，我马上率全军连夜以强行军速度掉头疾进，驰返前线。到达宜都附近之长江南岸时，敌我尚在混战，我们未及休息就投入战斗。经几日激战，我军歼敌一部，并将其余的敌人全部驱逐回江北，恢复了原有阵地。此后战区长官部取消了让第8军撤往后方休整的命令，命我部继续驻守这一线阵地。日军方面亦未敢再轻举妄动。

1943年初，根据战区长官部指示，第8军改归第20集团军建制。不久旧历春节到了，我趁有空闲，将军务交代给副军长何绍周和参谋长潘华国等，带了几名随从，专程前往集团军总部驻地湖南桃源县城，晋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将军。我与霍将军原来并不熟识，但他人很热情，一定留我叙谈了两日方准返部。归途中，我又顺路在家乡石门县城略作停留，与家人小聚。

我在石门县城方住了一日，忽然接到战区长官部陈长官转来的一封蒋介石先生侍从室急电，命我即日返渝，等候蒋委员长召见。因事出突然，我偕夫人陈碧莲连夜赶回军部，匆匆与何绍周、潘华国、舒适存等告辞，动身赶往重庆。

那时由宜都去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我与陈碧莲先在三斗坪乘竹筏逆江而上抵达巴东，住了一晚，再换乘一艘

小火轮前往重庆。

真没想到，我这次去重庆，是接受一项新的重要任务。从此就告别了战斗了两年多的鄂西前线，告别了我曾倾注了极大心血的第8军。

我离开第8军后，由何绍周将军接任军长，该部不久奉命调驻云南，加入滇西远征军序列。日军侦知第8军调走后，乘机渡江南犯，再次突破宜都一线阵地，铁蹄深入江南达数百华里，我的家乡石门也沦陷了。我在县城的房屋，被日军焚毁，所幸家人均已躲避乡间，方免遭毒手。

从那以后，湘西地区成了抗日前线，敌我相持于常德一带。